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学素质教育阅读丛书

路在你的脚下



路在你的脚下

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一个平淡却并不轻松的故事。

因为家境贫寒，白天，他衣衫褴褛地在街头拣拾破烂儿；晚上，他穿戴整齐地走进夜校，孜孜不倦地学习着日语；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

经过艰苦的岁月后，知识的殿堂终于为他打开了一扇成功的大门。成功的背后，向我们所展示的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靠这种精神踏出来的一条希望之路。

不灭的希望

张金如 牛耕耘

母亲对他说：“儿啊，不跪了，起来吧，男儿膝下有黄金。”

很多年后，当本文故事的主人公张福龙向我们描述家境的贫穷时，眼睛里闪动着的泪花仍然在簌簌地抖颤着……

那一年的那一天，天黑时，张福龙一进家门，儿子就迎上来说：“奶奶发你的脾气了。”再一看，妻子正在锅灶后面流着泪呢。一问才知道，上午他不在家里，医生来给母亲看过病，开了张药方，划过价后一瞧，要60多块钱。母亲向儿媳妇要钱，媳妇回答说：“我身上分文没有，等福龙来你向他要吧。”左等右等，张福龙也没回来，医生起身告辞了。母亲躺下了，一句话不说，一口水也不喝，谁也不理睬。

张福龙赶紧去泡了一碗红糖水，双手捧到母亲床前，轻轻地叫了一声“妈”，没人应，叫第二声，又没应，叫第三声时，母亲翻了一个身，重重地说：“我不是你妈，我没有儿子，我明天就去找村里要求吃五保。”

张福龙泪水涌出，双膝往下一跪，连声向老人家赔不是：“妈，我知道自己外没法挣钱，内无力侍候家人！可我是尽了心的，你骂我打我都行，可你不能说我不是你的儿子啊！”

张福龙一哭一跪，门外偷听的妻子和儿子，也慌忙进到房里，跪在地上哭成一片。母亲闭上眼睛长叹一声道：“儿啊，不跪了，起来吧，男儿膝下有黄金。”

这一夜，张福龙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他同妻子商量，准备明天就进城去，一来帮母亲买副药，二来也向人打听一下可否找到活儿做。

为了筹集买药钱和路费，第二天一大早，张福龙便让妻子去借钱。妻子跑了半天，只借到了10元钱。10元钱，连一副药都抓不了，能干什么呢？妻子将揉得皱皱巴巴的票子交给了丈夫。张福龙怀揣着已经捂得发烫的10元钱，在妻子一遍又一遍“富有富的过法，穷有穷的活法，找不到挣钱的工作，就早点回来”的叮嘱声中上路了。

他将要去的地方，是离家二百多公里的省会——南京市。

从农村到城市，他在火车站广场睡了三天，第四天便随人去拣拾破烂

初到南京，张福龙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他怎么也分辨不清东西南北。不知过了多少马路，转了多少小巷，孤零零的他在城里跑来跑去。渴了，就喝一口凉水；饿了，就啃一点硬饼；困了，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打个盹儿。到了晚上，他也学着别人的样子，拾几张破报纸垫在身下，往火车站广场的地上躺，望着满天的星星，想着自己的境遇，仰天长叹。

偶然的一次，那一声声长嘘短叹，惊动了紧挨着他身旁躺着的一位民工模样的人。这位与他有同样遭遇的老大哥听完他的陈述后，笑了笑，说：“只要你手脚勤快，不怕吃苦，有的是力气，破烂堆里也能生财。不信，你明天就跟着我去试试。”

到了这份上，还有什么可挑挑拣拣的呢？

就这样，张福龙手里拿着一根小木棍，提着一只编织袋子，跟在这位老大哥的屁股后面，东跑西颠，拣拾起破烂来。

一个礼拜干下来，大大小小的毛票加在一起，竟也有百十来块钱。之后，他在南京城外一个叫“大庄”的地段，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拣拾破烂儿人住的“集中营”旁边，找到了一间仅有八九平方米的简陋民房作为自己的“落脚点”。

混杂在城里不息的人流中拣破烂，日子久了，张福龙发现酒楼饭店等消费娱乐场所，最忌的是衣服脏兮兮的拾破烂的人走来走去。有几回，张福龙还没走近一家酒店的垃圾堆前，就被站在门口的迎宾小姐很不客气地轰跑了。此后，张福龙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有时还主动帮助这些场所搞卫生，干些苦力的杂活。一来二去，就和这些地方的人们混熟了，他有了为他提供破烂的固定“客户”。

如此下来，张福龙每个月能挣到四五百元。拿到钱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奔邮局，把自己用汗水和辛苦换来的钱寄回家中。他深深挂念着那虽然贫寒但却温暖的家。

一个叫李载晃的韩国青年意外地闯进了他的视野，从此他的人生有了转折

岁月在拣破烂的生活中流逝。张福龙的心也一天天不安起来。

他不敢写信回家。他只是在汇款单的附言一栏中告诉家人说他“很好”，而且也有了一份“挣钱”的工作。他怕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村里的人会看不起他的家人，笑话他的卑微。

他不甘心自己天生就是一个“与破烂打交道的人”。他觉得城里人的自豪与他这个乡下人的自卑，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你有没有工作和工作的好与坏。哪怕是有有一个临时的工作，说话做事也比他这个“拣破烂”的要硬气。

1993年春节的一天，当他到影剧院收拾易拉罐等废品时，无意中看到了南京市最大的一家电影院——影视百花园的门前张贴着一张招聘服务员的海报。他便想：自己以往在影剧院碰到的服务员所干的差事，不就是招呼招呼客人，查看门票，维持场内秩序等一些并非很复杂的活儿吗？而这些活儿，对于他这个受惯了苦累的农村青年来说，又有哪样能被难住呢？于是，他也没有细看海报的内容，就径直跑到了报名接待处。

当接待人员问他“你来瞎凑什么热闹”时，张福龙被问得噎住了。原来人家要的是女服务员，而且招的是有南京市户口的人。他又符合哪一条呢？

在往回走的路上，张福龙越想越觉得不甘心。于是就急急忙忙地从他所住的小屋里，翻出一套平时不舍得穿的西服，将自己上上下下收拾了一遍，又返回到“影视百花园”，直接闯进了经理室。

也许是他纯朴憨厚的本色起了作用，主持这家“百花园影院”工作的沙振荣经理二话没说，就将他留了下来，除了给他安排一份打杂的活外，还让他“学放电影”。自此，张福龙终于有了一份他向往已久的“工作”。

在经历了无数次与高文化层次人们的接触后，张福龙开始意识到了自己与城里人在知识修养上的悬殊。

张福龙坐不住了。他回到小屋，拿出了自己随身带来的《新华字典》，趴在地铺上，开始了一个字一个字的学习。整整525页，张福龙凭着一股子

钻劲和韧性，将一部《新华字典》又抄写了一遍。与此同时，他还买来一些与中国的人文地理相关的书籍，坚持“每天一读”。

一天，张福龙在前厅当班。当一部国产故事影片放映到半截时，一个斯文的年轻人离开了座席，走到了前厅。张福龙很纳闷：“放着好好的电影不看，怎么跑出来摇头叹气呢？”于是，他就走上前去询问：“是不是嫌放映大厅里的空调打得不够，还是……”

当这位年轻人微笑着用生硬的普通话回答时，张福龙这才发现：这个长相与中国人一模一样的年轻人，原来是刚从韩国汉城来到中国南京中医学院留学深造不久的大学生，叫李载晃。他头一次来“影视百花园”，是想试试自己能否看得懂中国的电影。开头，光看画面还能凑和着对付，可往下一听人物的对话，就“看”不懂了，只好中途退场。

一切是那么突然，又是那么自然。几句问候后，张福龙便直截了当地向李载晃表明自己想学习韩国语，要拜他为师。没料到，话一出口就得到了对方应允。

韩国语是一种字母文字，由40种音母组成，不但不易于记忆，写起来也十分别扭。为了考验张福龙是否是一时的冲动，李载晃在教完了他全部字母后，告诉张福龙：“过半月后，你再来我这里进行测试，如果过关了，我们就可以正式上第一课了。”出乎李载晃预料的是：只一个星期下来，张福龙就将全部韩文字母背得滚瓜烂熟，随便怎么抽考，张福龙都能顺顺畅畅写出来。从这以后，张福龙一到下班时间就赶紧往李载晃那里跑，韩语的功底也日渐长进。遗憾的是，半年之后，李载晃就归国了。

当时在南京城里，张福龙几乎转了一个遍，也没打听到有一个系统教授韩语的辅导班。他只好拿着刊有“金陵国际语言进修学院”招生简章的《扬子晚报》，按图索骥，找到这家学院进行咨询。在征求了学院老师的意见后，他选择了日语，并在1993年暑期报名入学。

为了学习，他卖掉了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甚至去卖血

为了保证听课时间，他不得不辞去“影视百花园”晚班的工作，又开始了这样的生活：白天，他一身素装去拣拾破烂；晚上，却西装革履地在夜校学习日语。

从夜校到张福龙居住的牛毛毡小屋，来回要走3个多小时路程。每逢有课的这一天，他都带上一干粮，第一个出现在教室里，晚上下课后，他便走一路，拣一路的破烂。回到小屋后，不管多晚，他都要将当天所学的功课温习一遍。碰到不能记住的词语，他就顺手写在墙上，让自己第二天早晨醒来一睁眼就能看到。

业余学习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不少人学着学着就半途而废了，而张福龙却硬要坚持下来。从1993年暑期开始，与张福龙一同参加日语初级班学习的同学共有200多人，可还没到中级班结束，就只剩下不到10名学员了。在这最后的几个人中，除了张福龙是个没有任何学历的农村青年外，其余都是到此来学第二外语的在校大学本科生。和这些大学生一起学习，张福龙丝毫不敢懈怠，他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要比别人多得多。

他没有“随身听”，随身带的是自制的日语会话一千句小册子。为了校正自己的日语发音，他不放过每一次学习和练习的机会。当他从韩国朋友李

载晃的来信中得知，南京中医学院有一位从日本来的名叫森永忠夫的留学生还在继续攻读时，就急忙找到了森永忠夫的寓所。没想到，森永忠夫和张福龙连照面也没打，就叫服务员小姐把他给“打发”了，他连续三次都扑了空，但他没有泄气。接下来，他便是一次次地打电话向森永忠夫说明自己的意思，一封接一封地写信向他表白自己的诚意。

或许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森永忠夫终于伸出了双手，接纳了张福龙这个农民学生。他们除了每周一晚上的“会话”交流外，张福龙还每隔十天半月，将自己归纳整理出来的一些疑难问题向森永忠夫求教，并请他帮助自己校正语音。森永忠夫结识了朴实好学的张福龙，免去了张福龙“电话预约”的负担，告诉他：“什么时候你来找我，我都会欢迎你这个农民朋友。”以前，森永忠夫也曾有过好几个中国朋友，后来都散了。原因是，他发现那些人都是想通过他找担保人去日本。所以，从那以后，森永忠夫就不愿再交中国人做朋友。而与张福龙的交往却改变了他的看法。

日日夜夜的煎熬，使得张福龙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眼圈发青。一次，他的同学从学校赶来，看到满嘴是泡的张福龙，一手捧着一本书，一手正从雪地里抓着雪充饥，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当同学随手拿起一本日语杂志要翻时，张福龙却背起那本杂志的目录来。一边听着张福龙朗朗上口的背书声，一边环视着张福龙的小屋，这位同学从身上掏出30块钱，放到了张福龙的手中。他发现张福龙那一边学习、一边拣拾破烂的双手，粗糙得已经布满了裂口。

没有了挣钱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也就没有了经济支柱，因此，他也吃尽了苦头。

1994年的夏秋之交，江淮地区没完没了的雨总是下个不停。不能外出拣拾破烂，120元的生活费从哪里来？80元的房租，谁来替他交？还有，他那乡下的妻子，每逢月头还在眼巴巴盼着他往回寄100元钱呢！更为重要的是：新的一学期开课在即，那几百元的学费又从哪里出呢？

情急之中，张福龙悄悄地来到了一家医院的血库，要求献血。护士看到他眼圈发青，就婉言劝道：“你身体这么瘦弱，不适合献血。”

张福龙连忙恳求道：“我和我的家里都急需用钱，请帮个忙吧！”

护士只好同意他的请求。

此事感动了金陵国际语言学院的老师们。他们不但免了张福龙第四学期的全部学费，而且还退回了他前几个学期的钱。

又是一个雨夜，张福龙背着书包正往回赶。当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郊区漆黑无影的小路上时，忽然间，一道闪电击中了他。张福龙只觉得眼前一阵发黑，双膝一软，晕倒在秦滩河堤上……等到他被雨水浇醒，拖着沉重的身子回到小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日语课本，一页一页地在灯泡下烘干，直到天亮。

一个拣拾破烂的农民，他读日语究竟想干什么

就像阿里巴巴咒念“芝麻开门”，打开四十大盗的宝库一样，靠着历经磨练而铸成的生活信念和痴心不改的追求，知识殿堂终于对一个拣拾破烂的执著的农村青年，启开了通向成功的大门——

两年后的张福龙，顺利地通过了上海日语定级统一考试，捧回了日语二

级证书。

出乎意料的是：1995年7月，张福龙放弃了南京翻译院、南京台湾新潮皮件五金有限公司等20多家单位的聘请，以及“金陵国际语言学院”要求他留校任教的挽留，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江苏省仪征市大仪乡。

他放弃了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令无数人感到不解。

张福龙的回答是：他现在最想的就是到日本去学一些先进的知识回来。

通过学日语，他知道了日本农业科技生产相当发达，特别是在对蔬菜新品种的研究方面。另外日本的千家万户都铺设榻榻米，这是由灯芯草的植物茎编织而成的。而在他的家乡就有种植灯芯草的历史，他的父辈们至今还保存有编织这种草席（日本人叫榻榻米）的手艺。他想，如果充分利用沿江滩涂和水库边的农田，大量种植，并精心编织成日本人所喜欢的样式，然后再销到日本市场上去，就不愁日本商家不来仪征这片土地投资办草席公司。那么，他那贫穷的家乡就不愁找不到一条脱贫的道路。

然而，他的“梦”能圆吗？

在回到家乡后的日子里，张福龙一边坚持自学日语高级课程，一边向日本国方面联系出国留学事宜。40多封记述着他经历与坎坷的信件从他的家乡仪征市发出了。

数月后，终于有两家大学同意接收他去“留学深造”。一家是琦川县的川口日本語学院。这家学院来信说，他们不需要出国担保人，但张福龙必须要向他们出示他本人在银行持有38万元人民币存款的证明。另一家则是东京国际日本語学院。院长横小路喜代仁被这位中国农村青年的求学精神感动后，亲自从日本打来电话向张福龙本人核实了解情况，并给他寄来厚厚一沓子学校的资料，向他说明他必须要找到出国担保人。

毫无疑问，38万元，对于张福龙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就是让他倾家荡产、砸锅卖铁也远远凑不够这笔钱哪！张福龙只好申请进东京国际日本語学院入学。

出国的担保人又到哪里去寻呢？谁又愿意为一个曾经是靠拣拾破烂养家糊口的农民去冒这个风险呢？

就在我们因此而为本文的主人公担心时，张福龙从他的家乡专程打来电话，带给了我们一个“好消息”。发现和培养张福龙的伯乐、66岁高龄的教育家、南京金陵国际语言学院院长涂元唏老先生，在这段日子里，从南京到仪征，又从仪征到南京，马不停蹄地一次次为他出国留学的事宜奔波。而且还告诉张福龙，自己愿意做张福龙申请出国的担保人。

按规定，担保人必须持有20万元人民币作为担保金。20万元，对于涂元唏老人来说，也是一笔巨额的款项。为了凑足这20万元，他专门召集了由学院各方人士参加的特别会议。会议的参与者都愿意取出自己未到期的存款来，转到涂元唏老人的账户上。目前这笔款项已全部凑齐。涂元唏老人也已经和张福龙一道去办理了资金公证。

出国的手续是非常繁琐的。仅4个月的公证，就让张福龙跑坏了一双旧皮鞋。值得庆幸的是，张福龙所到之处都是绿灯大开：跑了20多个单位，盖了20多个公章，却没有要张福龙花一分钱。

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出国留学需一次性交纳一年的学杂费人民币6万元整。东京国际日本語学院知道张福龙的情况后，放宽了对他的要求，同意他只需暂时交纳3万元，剩下的3万元待他入学后再补齐。而要凑齐这3万

元，对于张福龙这个无固定收入的农民来说，不知如何才能办到……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张福龙人生道路的紧急关头，总有人间的爱心与温情在支撑着他——

今年元月，张福龙在南京第四十二中学为全体师生讲述他自强不息的奋斗经历时，一千多名学生自发地组成了一支“集资大军”，将他们平时省吃俭用省下的那一元一元的零花钱，送到他的手中。其情其景，使张福龙这个硬汉子当时就泪水盈眶。

张福龙的事迹也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们，无数颗滚烫的心汇聚成了一股暖流……南京生物研究所的黄宁先生、香港的港龙公司南京航空站的陈小姐、以及江苏电视台的武编辑和上海新路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人……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走进了他那破落而又贫寒的家，众手同心，正在托起张福龙心中那不灭的希望。

她是一个弃婴，至今也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她是一个“灰姑娘”，在劳累和困境中长大；她命运多舛，求学之路分外坎坷，曾四次与大学失之交臂；她自强不息，发奋写作，终于靠自己的努力感动了“上帝”——被部队特招入伍并送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学习……

她的名字叫孙乙。

从弃婴、尼姑到大学生

刘学红 王秀全

1996年春节前夕，在团中央举行的“首都高校老少边穷地区留校学生新春联谊会”上，孙乙被特意从外地请到北京，向大学生们讲述自己的求学经历。站在话筒前，孙乙感慨万端，激动得几次泣不成声。从台上下来，她立刻被在场的记者围住了。

军帽下，孙乙那一双闪亮的眼睛里，平静中透着刚毅。她说，她最不愿谈的，就是自己的过去。她说，每到节日或自己的“生日”，她的心情就越发沉重，那是她感情最脆弱的时刻。

“我要上学！我想读书哇！”

1973年8月了日，一位好心肠的大娘，在安徽马鞍山钢铁医院门口捡到了一个弃婴，并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执意把孩子收养下来，取名“华子”，那就是孙乙。孙乙管大娘叫“奶奶”。奶奶因为孙乙与家人闹翻了，带着她离开家搬到堆放杂物的窝棚里住下。

奶奶叫薛王氏，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靠给人打零工维持生活。奶奶买不起奶粉，小孙乙是喝米汤长大的。为了抚养孙乙，薛王氏拉煤、洗衣、做保姆。几年后，薛王氏的丈夫去世了，她只好带着小孙乙到安徽庐江县的独生女儿家里去住。从此，除了奶奶，小孙乙又有了“养父养母”。

新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养母经常与养父吵架。在吼骂声中，孙乙刷锅、做饭、洗衣、带妹妹，从六七岁起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1978年，孙乙5岁了，奶奶带着她到一个姓邱的小学老师家里看孩子。邱老师让喜欢翻书的孙乙在自己的班里旁听，期末的时候，孙乙竟考了个全班第一名。邱老师和奶奶又惊又喜，几次找养父养母软磨硬泡，孙乙终于背起了书包。

为了上学，孙乙很早就起来做家务活，晚上也睡得很晚。有时活计忙不过来，又不愿意耽误上课，她就在书包里装一块凉山芋当口粮。这样，孙乙断断续续读完了小学和初中，成绩一直位居班里前三名，上学的费用基本上靠奶奶打零工获得。

1986年6月，含辛茹苦的孙乙好不容易盼来了中考。然而，一直不情愿让她上学的养母却在这时开了一个“价码”：考不上省重点高中就别想再上学。孙乙相信自己的实力，中考连考几科都很顺利，没想到在考数学时，养母因和养父打架，喝了农药被送进医院。得知这一消息，孙乙扔下刚做了一半的试卷，拔腿就往医院跑。养母被救过来了，孙乙却得到了一张普通高中录取通知书。

吃苦受累，孙乙都能忍受，但她无法接受就此辍学的厄运。她哭喊着对

奶奶说：“我要上学，我想读书哇！”奶奶也泣不成声，但却没有办法。

孙乙一气之下决定离家出走。晚上，孙乙悄悄起床，把“存钱罐”里的2元5角9分倒出来，背上书包上路了。她要到省城合肥去读书！到了合肥她懵了，四处乱撞，被人当作迷路的孩子送进了派出所。第二天，孙乙被养父接回了家。

孙乙终于上了高中。

上高中的孙乙，境遇并没有好转。由于长期紧张和劳累，加上常年营养不良，她的身体非常虚弱，经常头晕眼花，无故呕吐，没几个月就瘦得皮包骨头，头发稀黄。奶奶东拼西凑了些钱，送孙乙到医院看病，被诊断为“胃神经性呕吐”，不得不休学治疗。

养母不懂医，以为孙乙得了精神病，要把她送进精神病院，一向不多言语的孙乙与父母大吵了一架，这更让养母以为她是精神病，强行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在医院里，孙乙条理清楚地回答了医生的问题，医院拒绝接收孙乙。

为了打消孙乙的读书念头，养父母当着孙乙的面把课本撕得粉碎。孙乙发疯似地哭着上前抢回撕碎的课本，又一页页用笔抄清。

这一次，孙乙铁了心要离开家。奶奶只好再次把孙乙送进了20里外的水姑庵，祈求“菩萨”能保佑她。此前，由于生活困难，奶奶曾在孙乙11岁的时候，把她放在水姑庵“寄养”过两年，没想到，时隔不久，孙乙二进佛门。1986年8月，13岁的孙乙削发为尼，法号“静月”。

在尼姑庵，静月那颗“我要读书”的心不死。书是静月清淡生活中唯一的希望与寄托。夜静时分，她偷偷地点上蜡烛读书。微弱的烛光、沙沙的翻书声，在静夜里惊扰了一墙之隔的师太，一声“干咳”引来了劝阻：“睡吧，这样师太会不高兴的。”

静月不甘心就这样静下去，1987年2月，她在中学好友的鼓动下，重新回到了“俗界”。

回到家里，她知道等待她的将是什么。于是，在奶奶、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孙乙办理了到新疆寄读的手续，千里迢迢赴新疆求学。

“我的故事也许是最坏的，但是，只要没有结束，我就决不放弃努力！”

1987年初春，14岁的孙乙登上了北去的列车。一路上，望着玉门关外荒凉的沙漠，孙乙只感到心口压抑得难受。上学读书，对别人家的孩子来说，也许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对她来说，却要经受这么多的曲折和磨难，她不懂这是为什么！

越难得到就越珍惜。在新疆阿图什市的一所中学里，孙乙的学习成绩很快在班里名列前茅。边疆地区的考生高考录取时可以照顾30分，孙乙觉得她要读书，要上大学的愿望已经不是梦想。高考临近，孙乙几次给家里写信，请求转户口，却一直没有回音。于是，她想返回安徽办理转户口手续。当孙乙乘着南下的火车心急火燎往安徽走时，奶奶也正心急如焚地坐着北上的列车往新疆赶——去给她送迁移户口手续。此次，奶奶是卖掉了自己最后一件可以卖钱的东西，破釜沉舟要帮孙乙考上大学，没想到祖孙两人擦肩而过，南辕北辙，孙乙的第一个大学梦就这样失之交臂。

回到家，孙乙大病了一场。一个月后奶奶也病恹恹地从新疆回来，祖孙俩抱头痛哭。为了生存，15岁的孙乙不得已穿上肥大的工作服，顶替养父到

工厂里当了一名电焊工。每天下班，奶奶跑东家走西家找眼药，给孙乙滴在眼睛里减轻电焊光造成的刺痛。可是孙乙感到最疼的不是眼睛而是心，一颗几近破碎的心，她还是想读书！读书，上大学，这几乎成了孙乙生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她要靠自己的奋斗来改变不公平的命运！

孙乙又拿起了书本，白天上班，晚上学习，并尝试着用笔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怀。她的处女作《奶奶之歌》发表于1988年3月的《巢湖报》上，之后又连续发表了十几篇习作。同时，孙乙报名参加了汉语言文学专业高等自学考试，半年通过了三门课程的考试。然而，她最终还是没能完成学业，这年10月，她应该到300里外的巢湖去考试，可是她再也没有勇气向奶奶要路费了，奶奶为了她付出得太多了。这次是她自己打碎了大学梦。

不久，又有一个机会，西安交通大学要在厂里招收4名委培生。孙乙顺利通过了考试，然而，却因“工作年限不够”让别人顶了。

1989年5月，已经调到厂医务室工作的孙乙参加了成人高考，报考中医学专业，并被安徽中医学院培训学校录取。为了凑齐学杂费，孙乙想到了卖血。她避开熟人的视线，一次又一次地从庐江赶到巢湖去卖血。巢湖并不是每天都需血，为了少花点冤枉路费，她拿着自己的录取通知书请求大夫：如果有需要输“O”型血的病人，请马上与我联系。当孙乙激动地拿着录取通知书去找厂领导时，却被告知“自费读书需办理停薪留职手续”。这意味着孙乙要靠她自己筹集全部学费。就这样，第四次上大学的机会又从手缝中溜走了。

也许是经受的挫折打击太多了，这一次孙乙没有哭，她变得坚强了。她一边继续自学，一边更加发奋地写作。终于，又一个机会来了，由于她的作品《我也写自己》在“首届全国大学生写作竞赛”中获奖（凭安徽中医学院录取通知书报的名），她被推荐到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学习。这一次，孙乙决心主宰自己的命运，毫不犹豫地与工厂签了停薪留职合同。她说：“我的故事也许是最坏的。但是，只要没有结束，我就绝不放弃努力！”

1990年2月，不满17岁的孙乙来到了北京鲁迅文学院。除了交通费和学杂费，从家里带来的钱已经所剩无几。来自天南地北的同学有些已经是文坛上的佼佼者，他们善意地责备这个连起码的生活费都不能保证的女孩，说她不应该挤这条热闹的文学小路。

不管别人怎么说，孙乙顽强地走着自己的路。

“窗外是浓绿的世界，如线的长春藤像张巨大的网，覆盖在文学院的墙上，虽然夏季也有落叶，但它是绿色的。”孙乙在自己的散文《一片落叶》中这样描述。

孙乙不是落叶，而是一只孤鸟。在北京的日子里，她天天不倦地飞来飞去，上午听课，下午卖报。为了读书，孙乙开始了艰辛的半工半读生活。100份报纸，净赚一块六，可勉强维持一天的伙食。

暑假里，她给人当保姆，打短工，挤时间学习和创作。开学前，一部蘸着汗水和泪水写成的32万字的长篇小说《叛逆》完稿了（后更名为《女孩的山路》）。

新学期开始了，孙乙的学费还没有着落，仅每月的生活费就已经让她精疲力竭了。她不愿再向同学们求助，只得暂时忍痛弃学，打工赚钱。经人介绍，孙乙来到北京空军某部驻京招待所当临时工，做些洗被子、帮厨之类的杂活。一有空闲时间，她就大量读书，写文章练笔，向文学界的前辈请教。

这期间，她在《人民文学》老领导楼适夷家帮过忙，楼老抽空就给孙乙讲授文学创作理论知识，帮助她修改书稿；孙乙一边如饥似渴地读楼老的藏书，一边想着法儿地给楼老做可口的饭菜吃，一老一少相处得和谐融洽。

孙乙不时有新作问世。1990年10月，她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没有结束的故事》（署名孙卫华），引起读者很大反响，书信像雪片一样飞来。

“不论将来做什么，一定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像雪片一样飞来的不仅有读者的来信，还有社会的关怀。孙乙的坎坷经历和善良、勤劳，赢得了人们的好感和同情，许多人在默默地帮助她。

1990年底的一天，孙乙到她当过临时工的部队招待所取读者来信，看到厨房里很忙，便挽起袖子帮着干了起来。当孙乙端着盘子往外送菜时，发现人们的眼光全都集中在她的身上，一种自卑感袭上孙乙的心头，她红着脸低着头退了出来。她干完活正准备要走，只见招待所所长引着几个穿军装的人向她走来。

“小鬼，想当兵吗？”一位首长问孙乙。

“当然想了。”孙乙认为首长是在跟她开玩笑，便漫不经心地回答。

“你办好入伍手续，我们就收你，部队也欢迎你这样好学上进的女孩子。”

尽管孙乙很羡慕军人，但她却从来没敢想自己能当兵。部队好是好，但几年兵当下来，退伍以后，她又该往何处去呢？她仍然想继续读书。经过反复思量，最后，孙乙还是决定投入部队这个大家庭。漂泊了6年，她太想有个家了，在部队招待所当临时工的经历，使她相信部队能够给她一个温暖的“家”。

1991年1月7日，在那位空军首长的关怀下，孙乙被成都空军某部特招入伍。部队的首长和战友给了她许多真诚的帮助，成都军区空军黄恒美中将、梁英少将、刘振起少将、朱伯儒少将，成都军区郑贤斌中将、陈世俊少将等将军都曾关心过这位历经磨难的女兵的成长和进步。

在军营，孙乙主动深入连队体验生活，写报道。到1995年初，孙乙在军内外的报刊共发表480多篇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同时出版了纪实性文学专集《少女往事》。1994年，20岁的孙乙申请赴西藏采访锻炼，采写发表了一组反映戍边将士风采的报道。1995年正月初三，孙乙连夜赶写的一篇关于甘巴拉雷达站官兵过年的报道《春到甘巴拉》，在《中国青年报》头版刊出。

在孙乙的新闻报道见诸报刊的同时，她本人的故事也频频在报刊出现。她的坎坷身世、她的奋斗经历、她的成长感动了许多的人。在南京政治学院副院长张天荣少将等有关领导的关心下，去年9月，孙乙被所在部队送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学习，她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为了这一天，孙乙苦苦追求了整整10年！

穿着军校学员军装的孙乙，眉宇间带着一股英气。“在别人看来，我很坚强，其实我只不过不愿在别人面前流泪。”谈及自己经受的20多年磨难，孙乙说：“我笃信自强、自尊、自爱。我觉得，困难是可以战胜的。弱者的可悲在于跌倒后的消沉，而强者的可敬在于跌倒后能重新站起来，不向命运

屈服。”

今天，对于孙乙来说，最快乐的事情仍然莫过于读书、写作，她最大的愿望是让自己的知识更渊博。孙乙讲得很坦率：“以前读书是为了不被别人看不起，不挨欺负，不愿意稀里糊涂过一生。现在读书是想回报社会、回报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也让自己的心里更充实。”

说起回报，孙乙最忘不了的是奶奶。去年国庆，孙乙曾回到“老家”，令她不能相信的是，82岁的奶奶在她当兵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奶奶在弥留之际，叮嘱家人不要告诉孙乙，她不愿让孙乙伤心。孙乙深情地用手捧了一把黄土撒在奶奶的坟上，她哭着说：“奶奶，你为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可是我还没能让您过上一天好日子，您就走了……”那个夜晚，孙乙在奶奶临终前住过的防震棚里流了一夜的眼泪。

孙乙的心里装着一大串好心人的名字，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向她伸出了温暖的手。说起这些好心人，不善言辞的孙乙显得很激动：“不论将来做什么，一定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张士柏是一位美籍亚裔杰出青年。他曾喜欢游泳、滑雪、武术；他还喜欢汽车，渴望将来能拿到驾驶执照；他刻苦训练游泳，为了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取得好名次，在一次训练中，由于起跳过猛，头部触及池底，造成颈椎骨断裂，高位截瘫。为治病，他强忍剧痛，任四根铁钉穿过头部。他在病床上学完八年级最后三个月的课程，又用三年时间以全校第一的成绩完成高中四年的学业。美国总统布什亲自签名为他颁发了“学业成绩奖”。他的成功“秘密”使美国四所大学为他敞开大门。他又用一年时间学完两年大学课程，越过硕士直接考入斯坦福大学博士班。他在中国建立了“张士柏中心”，用美国最新方法教授英语，他又在自己18岁生日那天，宣布将父母给自己今后生活的抚养金20万美元，捐给父母的故乡浙江宁波北仑的教育事业……他做这一切都为了什么？他说自己全部行为的动因是：回报社会！再有就是他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驱使他与自己的生命赛跑，他要以自己的病残之躯拼搏出一条使生命通向永恒的辉煌的路。

张士柏和他的秘密

沙琳

不要拒绝别人，当别人需要你时……

5月，在北京朝阳医院的多功能厅里，整整齐齐地坐着数百名头上系着白巾的年轻护士。大家都在等着张士柏，一个胸部以下失去知觉的残疾人，一个为我们正常人社会、为他的中国做了许多的“大孩子”。

他是一位美籍亚裔杰出青年，他的事迹通过传媒传遍了全世界。有一篇英文文章的题目是“在这个中国学生的字典中，没有‘不能’二字”。

“大孩子”坐在轮椅上出现在门口，可人们根本看不见他，他被朝阳医院四五个身体健壮的工作人员围簇着抬举着向台上走去。

他坐在主席台后面，看起来高大魁梧。他表情很平静，好像在听介绍另一个人的事迹，偶尔笑一下，很灿烂，这笑容被旧金山的华裔称为“张士柏的微笑”。

我有些吃惊，周围的许多人比他大许多，在第一次听到他的故事时，竟然热泪滚滚。

会场上大多数人得到了他和姐姐张士梅编写的《张士柏英语网》。7月8日那一天，国内各个角落将响遍他的声音，“张士柏英语网”从那时起将一周四次播出。此前，他已乘着轮椅去了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教育台的播音室。

他的外表淡泊，往往使人忽视他的力量，但他内在的东西却在《张士柏英语网》里表达了出来。

第八课 伸出手去帮助别人

伸出手去帮助别人。我必须坚强，因为他需要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总和你在一起。你总会得到我的爱和支持。先采取行动，忠于你，支持你，幽默感能使你大获成功。不要拒绝别人，当别人需要你时……

第十五课 驾驶梦中之车

柏：最新一期 Road & Track。

梅： Road & Track？啊，汽车杂志……小柏在小学时就开始制作汽车模型，到 10 岁或 11 岁时，便能够装遥控汽车了。

柏：因为那时我还太小，不能开汽车，只能玩玩遥控汽车，等待长大了能拿到驾驶执照……我如今知道，我受了伤，人们会认为这个梦想永远只能是个梦。可是，你知道究竟怎样……我始终追求我愿望中的事情，让一特定的梦想变成现实……我有许多梦中之车，它们全是跑车，法拉利、保时捷、朗伯古尼……我的梦中之车就要风驰电掣，飞驶在宽阔而不见尽头的快车道上。我还要戴着太阳镜……

“我有一个秘密，请不要对我家里人说。”

一个叫唐贤可的旅美商人在台上介绍张士柏的事迹。他说他整整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才把这个心目中传奇式的人物找到。从此就跟这个被美国华人社会誉为“华人第一家”的家庭结下了特殊友谊。唐贤可在美国东西海岸和中国各地宣讲张士柏的事迹。

唐贤可的热情和经验，使他总是成为张士柏报告会的主讲：

1987 年 2 月 12 日下午，年仅 13 岁的美国少年游泳运动员、加州一所中学八年级学生张士柏，为了五年后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拿到好名次，刻苦训练。由于起跳过猛，头部触及池底，造成颈椎骨断裂。经过 72 小时抢救，医生终于在最严酷的诊断书上签了字：他已经高位截瘫，不可能再站起来……为了治疗，四根长长的铁钉穿过这个孩子的脑袋，他强忍剧痛，配合医生。他在病床上学完了八年级最后三个月的课程。四年高中课程，他又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布什总统知道了这个华人孩子的事情后，亲自签名颁发了“学业成绩奖”。他的化学老师埃万斯基问他，为什么这么拼命？他说，我有个秘密，请不要对我家里人说。这个秘密使埃万斯基非常感动，他写了感人至深的推荐信。这封信使一向庄严矜持的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等四所世界驰名大学的学校校长流下了眼泪，同时向士柏伸出了手。

士柏选择了斯坦福大学，这所名校为了便于他学习，特地把教室从二楼改到一楼，又花了很多钱改装教学楼和宿舍的门和淋浴设备。在士柏所要经过的所有门前，都有一个突出的电动按钮，轻轻一触，沉重的门就开了。几年后，当天津电视台到美国拍摄电视剧《生命交响曲》时，斯坦福大学校长自告奋勇扮演自己……

士柏一年学完两年的大学课程，越过硕士直接考入斯坦福大学博士班。他想为中国做些事情，因而专攻“东方经济”。他和家人在北京建立了“张士柏中心”，这个中心目前主要是通过广播用美国的最新方法教授英语，以后还要研究“九五规划”，考察研究中国的汽车工业，提出一套新的经济管理方式。这也是他未来的博士论文题目。他为了在中国建立英语网，延长了博士学业。

一个骠悍的孩子受伤后的回忆

在京东清寂遥远的草场地，“张士柏中心”悄悄隐在一片民房和绿树之中。

我坐在“中心”的会客室等他。他中午需要修整，这不是正常人的午休，而是恢复机能。他要花上一小时甚至两上时干常人仅需几分钟就能做完的起床洗漱等事情——有一天早上，在美国拍《生命交响曲》的导演、演员，看到他妈妈、姐姐和弟弟为他洗涤，动作稍微快一点儿，他就头昏，要慢慢地按摩，腿要抬得很高，整整用了两个小时。在场的人全哭了。张的妈妈对他们说，你们看到的只是十分之一。

我被告知，士柏一切就序，于是被领进他的工作室。他在轮椅上略微有些疲惫地冲我笑着，面前摊着一本英文期刊。走近观察，他没有原来那么高大，脸色有些灰暗，还是那种置身事外的表情。他胸前有一条宽皮带把他绑在轮椅上。我知道他的状况很艰难，身子软如面条，如果没有一根带子，就要滑向地面。

颈椎损伤也波及到了手，他的手背和手指无力地垂着，手骨已经塌陷。他的四个手指头缩在一起套进一个奇形的锥体里，他用残存的臂力把它抬起，又靠地球引力落下，这是他敲击键盘的方法。桌上摆着台日本电脑，他说电脑是他半条命，他可以写、读，跟世界联系。他的《张士柏英语网》和每日大量的回信就是在这台机器上敲出来的。那天，“中心”的电子邮件一开通，就有300封信摆在上面。跟他通信的人是他的专家学者朋友，他们将被邀请来“中心”给中国出谋划策，其中有他的导师，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为使这些被邀请者有一张便宜的机票，他和弟弟曾瞒着家人专门到美国最热的城市凤凰城学习怎样考取旅游执照……这一切都要靠那只残缺无力的手和那个奇形怪状的辅助工具。

他不甚健谈，嗓音低弱，可当你知道他只有常人70%的肺活量时就不足为怪了。他短短的叙述中充满感激，总是回顾谁帮助了他：

我的父亲和教练都说，我很有可能夺取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蛙泳冠军。我原来确实非常健壮，喜爱游泳、滑雪、武术。那时我很顽皮。喜欢拆东西，也很会修东西。美国人厨房里没有油烟，也就没有修油烟机的，因而家里油烟机坏了全是我修。出事后，油烟机又坏了，妈妈想起来，又哭了……现在我好像只剩下半个人，胳膊、腿都不知到哪儿去了。

为了改善我的入水动作，教练抬着一根横杆让我跃过，我使劲跳入水中，突然眼前一黑，仅过了十分之一秒，又正常了。我看到有腿和手在我眼前晃动，我想，谁进入我的水道了？这是很危险的事，后来发觉那是我自己的脚和手，我知道出事了。弟弟把我救上来。有人去叫救护车，我面朝蓝天，枕着池边，身子漂在水上，教练扶着我的头。天上下着雨，雨一滴一滴落在我的泳镜上。这时我开始感到冷，以后我就一直感到冷了。从那时起我的身体就不能排汗，不能调节体温了。这天是12日，星期四，比美国人最忌讳的13日，星期五各少一天。

到今天我还不知怎么受伤的，这对我一直是个谜。所有人中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真情的。一天父亲非常郑重地对我说：“小柏，你这一生再也不能走路了！”听了这句话，我流下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一次泪，但这时我并没有真

正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以后每天都有一个新的打击，今天知道不能刷牙了，明天知道不能自己吃饭了……我这才知道跟我那些滑雪中跌破皮肉跌断腿，躺三个月就好的同学不一样。

我想妈妈该多难过！出事前，有好多女孩子请我参加晚会，我一直推，我姐姐问我为什么，我说不会跳舞。她跟妈妈讲了。妈妈听说有女孩子邀请我非常高兴，她跟我跳了第一支舞，还专门给我买了出席晚会的西服，但没过几天我就出事了！她非常伤心，几乎失去生命，以后她就放弃了心爱的画画，专门照顾我……现在我经常越洋飞行，一想要坐十几个小时我就不知该怎么过，特别是最后的六七个小时。妈妈坐在身边安慰我，上飞机下飞机，抱上抱下，她那么细弱的身子抱我这样一个大块头多么艰难！

我爸爸也几乎不去管他的商业经营，为我东奔西走，寻医问药。我受伤不久，他就带我去上电脑课，我一坐到椅子上就摔了下来。他用一根带子把我捆住。我当时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残酷。现在想爸爸是对的，他想让我尽早知道，一个残疾人是能干事的。

我姐姐特别关注我内心的变化，我坐着轮椅重新出现在校园，同学都不敢接近我，他们认识的是原来的我，不能接受我这样的形象。许多人奇怪，一个人为什么要坐在轮椅上？我过去也这样认为。他们不知道该不该帮我、推我，怕伤害我的自尊心。美国人内心有时是很封闭的。我姐姐发现后，就总是制造机会让我跟同学在一起。我当时很讨厌她，认为一个人在屋里不是挺好的嘛。她老找麻烦，劝我，你迟早要接近人，晚接触不如早接触。

一旦人们知道怎么帮助你，他们非常乐意。上打字课，一个女同学坐在我旁边，换纸、改错我都请她帮忙，后来她还推我去学校，推我换教室。她打趣说，她打字速度上不去就是因为老帮我。

问同学对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他们一定回答，张士柏上课睡觉。我一直以为我很会装，谁知别人都能看出来。一个老师很严肃地对我说：“希望你以后上我的课时不要睡觉！有一个同学听到了对他说：张士柏吃一种药，要不然他会抽搐。那个老师知道后很真诚地表示歉意，并要借给我课堂笔记。

中学毕业，我成绩很好，但不想参加典礼，因为有许多麻烦。这时校长来了，拿来典礼服装，说你一定要参加！400多个学生下午不上课，专门练习谁站在哪，谁推我到台上。路面不平之处专门修补好，演习了四五次。典礼时非常顺利，几乎可以说是完美，由我在台上发言，念毕业生的名字。

姐姐说：我们永远地看不到他痛苦的一面。

妈妈说：士柏的乐观使我们走出低谷

一个身材小巧的女孩子进来，是张士柏的姐姐张士梅。我想这是一种安排，她怕弟弟太累了。我知道这种采访有些残忍，他慢慢微弱下去的声音，渐或无神的眼睛都加深了这种印象。看得出张士梅本人并不情愿被采访，但为了弟弟她说：

我很小就知道生存的艰难。有一段时间我父母到中国去寻医问药，就剩下我照顾两个弟弟，那时我才15岁。早上5点我就起来帮助士柏，夜里一切弄完要到2点多。弟弟完全无依无助，需要一个人帮助他生存。这段日子给我印象很深。

士柏最了不起的是他的宽厚坚强。他看到过去参与过的运动好像没有感觉。我们仍一起去活动，我和小弟打网球，他就笑眯眯地坐在树荫下。巴塞罗那奥运会游泳比赛开始后，他坐在电视前，我从他脸上看不出什么。我们家不需要在他面前隐瞒什么。他老是觉得家里给了他太多，认为使家里快乐的责任在他。晚上我们一起散步，他的电动轮椅开得很快，跑到前头他就喊：你们有脚的怎么那么慢，快锻炼啊！没有一个残疾人会像他那样。他成了一个很受欢迎的人，同学都喜欢请他帮助，大考前他的电话不断。如果他受伤后很难过，我想我们家会有很大痛苦的。

我弟弟天性就乐观，同时他也想尽办法帮助家里，因而我们永远看不到他最痛苦的一面。

你问我为什么抛开自己的学业和收入很高的工作到中国帮助士柏？为什么经常写教材到夜里2点？我想，士柏帮了我们一家人，当他要去做一件事时，我们会尽力帮助他的。我想起小时候，学校每次都发给他十个奖品，而我只有一个，我怕回去遭妈妈骂，他说我分你一半。妈妈看后奇怪怎么只有奖品没有奖状？因为奖状上有名字我们没拿出来。弟弟就说，奖状有什么看的，还是礼品好……我小时笨手笨脚，经常打碎妈妈的东西，士柏有很高的修理技术，帮我粘上，妈妈看不出来。

我现在做的就是报恩。

看到弟弟歇息了一会儿，张士梅走了出去。我注意到有一个人一直在四周忙碌，那是他们的妈妈刘黎芬。她在替她的儿子打电话、接传真、写回信、接待来访者。她给儿子端来一杯水，那是一个有机玻璃杯，上面有刻度，一个长长弯曲的吸管伸到士柏难以活动的头前——他要严格吸入水量来调节体温。刘黎芬工作的地方有块大大的玻璃，透过玻璃能观察到儿子的一举一动。

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士柏刚出事的一段时间，我觉得生不如死，我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么优秀的儿子转眼之间就成了这个样子。在去医院的高速路上，我好几次想开车冲到崖下。我每天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而我的儿女却在邻居家。有一天晚上10点多，邻居打来电话说，我小儿子在她家吃过饭，正跟她孩子做作业。我当时猛醒——我有我的孩子，家庭，我有责任带他们走出低谷……我很高兴，士柏的乐观使我们能够走出低谷，灾难使我们家更加团结。

我全部行为的动因是：回报社会！

我问张士柏，是什么支撑他，配合妈妈爸爸，做了这么多事情？他想了想回答：是要回报社会。

他说社会给他太多了。他很奇怪从受伤的一刹那，一直到医院里，他都很清醒，因而看到了许多人给他的帮助。在救护车上那个年轻女护士双手捧着他的头，纹丝不动。他后来知道，正因为她的坚守，他才不至于更加严重，不至于臂膀瘫痪，靠一个假喉管呼吸说话。他对他的主治医生汤姆森也没齿不忘，他从来没见过这么认真负责的人，检查了他的病后，他把父亲叫到一边郑重地说：“一个将改变你们家命运的事情发生了，你儿子从今以后再也不能站起来了……这件事必须让你及早知道，这样更有利于对他的治疗，现在

问题是你去告诉他还是我去？”他父亲想了想说，还是自己去，那是一个父亲的职责。他在汤姆森医生关切的目光下走进儿子的病房。

汤姆森认为张士柏是他最得意的病人，五六年时间里，一直关心他身体上微小的变化。在张进入斯坦福大学后，汤姆森还去过他家，告诉他应该注意什么，特别要注意不能感冒。没过多久，汤姆森就因心脏病过世，士柏为此心情郁闷了很久。“我还记得那天的情景，好像是上帝特意让他来告别。汤姆森医生想的都是他的病人，可他把自己给忘了！”

还有他的家人，给他的印象是刻骨铭心的。那个可怕的日子后，他们就完全以他这个残疾孩子为中心进行运转。张士柏的父亲张东平一向乐善好施，曾经捐助 120 万元在宁波建了一个公园，他还选择了一个非常贫困的地方——河北迁安建水泥厂，没有一般谈判时的吞吐，一下子就汇去了 400 万美元。为了儿子他顾不得经营了。他的属下周经理对我说：“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有钱男人，我对他很忠诚，但是在决定建立‘张士柏空中英语网’的会上，我还是有话直说，表示反对。我们面临着坐吃山空的危险，建‘中心’就花了 500 万，承德那边的房地产我们撤了，迁安那边没有收益。电台不给我们钱，我们还要给电台钱。听了我的话他们夫妇沉默着，事后英语网还是建立了起来……”

这一切，张士柏都认为是社会的恩情：“我的生活每分钟都要靠他人，我体会到社会和他人的重要性。”

张东平是个善于观察、善于内省的人，曾在美获冶金硕士，在华尔街学过国际金融，自以为很了解儿子，但还是被他的一个举动惊住：

那天，士柏提出要过 18 岁生日，这是很少有的事情，因为孩子们从来没过过生日。我们把亲戚朋友都请来了。在晚会末尾，士柏突然宣布：他要把父母给他以后生活的抚养金 20 万美元，全部捐给父母的故乡宁波北仑教育事业。我们觉得很突然，一下适应不了，后来想还是孩子有道理……

回报社会！张士柏说他全部行为的动因就是这个。

我问他，中学毕业时，是什么秘密使他的化学老师感动？他回答：汤姆森医生曾悄悄对他说，一个高位截瘫者寿命比常人要短，要珍惜生命啊！他没有对家人讲，怕他们难过，而是暗下决心，在短暂的生命里，为他人做尽可能多的事。这也是他为什么拼命提前从中学和大学毕业的原因。

我临走时读到一封刚刚寄到“张士柏中心”的信，是一位女孩子写的：

士柏哥哥你好！我看了“东方时空”等媒介对你的采访，我知道你是优秀的，但这一切没有感动我……从今晚开始便不同了。今晚我身边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一直到 10 点钟我还没从坏心情中解脱出来，几乎想告别这个世界了。但是当我旋开收音机开关，里面飘出你的声音，那么亲切的声音。于是我关上所有的灯，一个人坐在黑暗里，看那收音机上一闪一闪的小灯，我陶醉在你和士梅姐姐的谈话中，那一刻，我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我深深感动，尤其当你用英语说“如果你需要帮助，请让我知道”时，我觉得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对我伸出援助之手，那就是你……如果你再也没有收到我的信，那就说明你的节目不够好，没能挽留住我对人世的依恋，所以不要让我失望哦！

这是一封没有写地址的信，女孩子叫麦嘉。

张士柏略笑了一下，眼睛往地下看去。

晚期肾衰竭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的人绝不仅是林健一个。而用自己微弱的生命之火点燃无数面临种种危难与困惑的人们的希望，使自己的生命热线延伸到千家万户的人，恐怕只有林健一个。林健一生被病魔缠身，却从不屈服，笑对人生，并为自己活得精彩丰富而感自豪。看来，命运有时的确不可战胜，而每个人的人生之路却是由自己走出来的。

生命热线 乔建宾

(0531)7971815——“您好，我是林健……”话筒里传出一个姑娘甜美的声音。

拨打这个号码的人都知道，这是一条不寻常的热线，电话的那端，那个为他们排忧解难的人，是一个身患尿毒症的姑娘。可他们不愿相信，这个给了他们信心和慰藉的姑娘，已完全依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正站在死亡的边缘。

这是一条用微弱的生命铸就的热线

7岁那年，小林健该上学了，却莫名其妙地发起了低烧，打针吃药全不管用。为了查明病因，医生给她做了3次骨髓穿刺，两次肝脏穿刺。妈妈常为女儿的病悄悄落泪。

第二年，林健终于背上书包跨进了校园，没过几个月，病情又突然发作。医生怀疑她得的是血液的毛病，让她住进了白血病房，同住的小朋友们过一段时间少一个，小林健慢慢明白了什么是死——“我们都坐在同一辆公共汽车上，有的人早一点下车，有的人晚一点下车。”她想。

病魔和林健较上了劲。考上高中后，林健又得了心肌炎，断断续续地上课，她成了班上的“病秧子”。同学们去为她补课，她身上插着各种各样的管子，却在灿烂地笑。

高中毕业后，林健根据自己身体的状况报考了电大。毕业后，分配到济南市立二院做了会计。

1989年5月，林健病重再一次住进省立医院，检查结果：肾小管酸性中毒引起肾结石，两只肾里长满了密密麻麻呈泥沙状的石头。随后的3年时间里，15次体外振波碎石治疗，每次要击打2000下，排出无数块结石，林健的腹部常被击打得浸出血来。

结石在逐渐减少，林健却又出现了肾积水、肾绞痛等并发症。到1994年夏天，最终恶化为尿毒症。那时，林健正准备与相识整整10年的男友张磊结婚。

晚期肾衰竭只有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了。林健很伤心，自己挣扎了20年就换得这样一个结果吗？躺在病床上，她突然觉得舌头发麻，说不出话来了。

林健觉得自己生命的代价太昂贵了，透析一次要花400多块，一年就要花掉五六万块钱。单位的公费医疗把她划到癌症病人一类，医疗费全包，还一个月发给她100多块钱工资。每次林健到单位去领治疗支票，都觉得那张薄薄的纸重得拿不起来。

为了养病，林健只能整天呆在家里，她笑自己对社会唯一的贡献就是给丈夫做一顿晚饭，她感到非常不安：这么多人用心血挽留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仅仅是活着，成为大家的负担，对社会没有价值，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她抹不去那个女孩昏迷的样子

在血液透析室里，林健看到了两种不同生命轨道的交叉。她和一些病友们靠透析来延续生命，另外一些人被送来透析却是因为服药轻生。林健看着自己胳膊上密密麻麻的针眼和伤疤——自己这么难还在坚强地生活，可那些人为什么轻易就否决了自己的生命？最让她受刺激的是，一个 20 岁的小姑娘，因为恋爱问题自杀，吃了 200 片安眠药，一瓶敌敌畏，双腕动脉被割开，死的决心特别大。

回到家里，林健心里老是抹不去那个女孩昏迷的样子，一个鲜活的生命，既然有那么大的决心去死，为什么不能拿出勇气去生呢？人如果在失去活下去的信心时，能向别人倾诉一下，或许一切都能避免。她想自己创办一条心理咨询热线，把自己对生命的体验告诉大家，打开一扇窗户给那些封闭的灵魂，而自己的经历不就很有说服力吗？！

林健和张磊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家经济拮据，装不起电话。他俩就四处奔波，讲述自己的想法。济南日报被林健感动了，资助 3000 多元为她装上了电话，还包下了电话费，并向全社会公布了消息。

这是山东省首家由个人志愿开通的心理咨询电话。当第一个热线电话响起时，林健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不同的人生，不同的烦恼涌进了小小的房间，林健用心听着，用自己人生的感悟宽慰了一个个需要帮助的人，她觉得自己一下子充实了起来。

打来电话的，有失去信心的重症病人，有遇到感情纠葛的少男少女，有“第三者”，甚至还有再婚遇到障碍的老年人。

林健发现，人们在生活中，思想和心理上有许多困惑和迷茫，因此，情感太需要沟通和交流，人太需要一个宣泄苦闷和烦恼的场所。

我的灵魂将在我帮助过的人心中升华

一个男青年打来电话，说活得没劲，社会不理解他，与家人处得也很紧张，心理承受的压力到了极限，已经自伤两次，还要第三次自伤。林健与他娓娓地谈了一个多小时，结束时，那个男青年自称心绪平静了很多。

一个女孩子从外地打来电话，说自己以前做酒店服务员，被一个老板看上了。老板给她包了房，让她辞去工作，还每月给她 5000 块，可是朋友们听说这事后都不理她了。她无聊，就打的出去疯狂购物来平衡自己，“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谁，又没有别的生存技能。”林健告诉她：“你一个月的青春、美丽和遭受的白眼难道只值 5000 块吗？你这是靠出卖情感得来的，你应当去自食其力。”后来，这个女孩打电话说去做了迎宾小姐。林健说：“你这样站在那里不依赖别人，靠的是自己，你是美的象征。”

由于小便困难，林健每天喝的水不能超过一斤，有时电话接多了，口干舌燥，她就含几颗石榴，实在忍不住再喝一口水。她觉得白开水很甜。

林健的身体依然虚弱，血色素只及常人的一半，到了透析后的第 3 天，

心脏负担过重，躺下都很难。

电话接多了，林健发现有些问题她解决不了，比如求医问药，还有一些女孩子遭受骚扰寻求帮助，她觉得无能为力，她想依靠一个组织帮助这些人。她想到了团组织，就给团山东省委写了信。

团市委的领导亲自找上门来，离开时，两眼红红的。

去年10月，济南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吸收林健为协会会员。12月25日，济南市青年志愿者“林健爱心热线服务站”挂牌成立了。林健主持热线与各界朋友探讨社会与人生话题。每周二是团市委“电脑红娘”爱心热线时间；每周四下午由心理学专家主持心理咨询热线；每周六下午为医学专家主持的医疗保健热线。

林健越来越忙，除了办好热线，她还主持了济南日报的一个专栏——“林健对你说”。

林健说：“一个人难得像我活得这么精彩丰富。假如有一天我的生命结束了，我不需要眼泪，我的灵魂将在我帮助过的每个人心中升华。”

马霞——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她放弃纽约高水平的生活，把余生全部贡献给中国。她的工作又快又好，外文出版社的同事们说她的工作量能顶3个专家。但无论在哪儿，她都能和大家打成一片，从不摆外国专家的架子。按时上班，给大家打水，有时还扫厕所。她穿的是中国早已过时的衣服，吃的是馒头火烧，骑的是飞鸽牌自行车，戴的是上海产的手表。她被确诊为癌症后，还阅改了五部著作和大量文稿。她有时偷偷趴在床上，或者躲在厕所呈清理浮肿破水的创口，但从没皱过一次眉，喊过一声疼。她在生命垂危时，异常坚定地支持丈夫出发，去完成他们共同的事业……因而她得到了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她的丈夫、著名自然保护作家唐锡阳先生以及无数普通人的深深的爱。她的人生走出的是一条平凡而又闪光的路。

马霞和我们同行 唐锡阳

我和马霞认识已经14年了。我们的结合，有点传奇，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和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性格不同，语言不同，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是大自然偶然把我们拉扯在一起，再经过长期的磨合、滋润、培育和塑造，使我们终于成为幸福的一对。我爱她，她爱我，爱我的女儿、女婿和外孙。我们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著作、共同的读者和朋友。国务委员、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同志读了我们写作的《环球绿色行》以后，写来一封含义深刻的信，其中还特别提到我们的结合：“异国同道，结成伴侣，宇宙之缘也。”

正当这种温馨的感觉愈来愈浓郁的时候，她病了，得了食道癌，而且已经扩散。

马霞是好人，是我最爱的人，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没想到命运总是这么艰难地折磨我。政治的，生活的，事业的，以及生离死别的坎坷，我都经历过。人生这本书，我懂得了应该认真地读；现在又翻开了新的一页，非常困难的一页，我仍然要认真地读下去。经过许多昼夜的思索，我的想法是：在不抱幻想的情况下积极治疗，给她最精心的照顾和最多的温暖。即使在临终的日子里，也要创造一种安详、通达、诗情画意和富有哲理的氛围，陪她走完生命的旅程。后来这个想法又深化了——在她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去了云南。

雪山的召唤

组织大学生绿色营是我们酝酿已久的一个行动。3年前，我们在《环球绿色行》的前言中就曾对青年们说：“这本书只能算是带了一段路，以后的路要由你们自己去走。我相信你们之中，会出现伟大的旅行家、探险家、科学家和自然保护的先锋，会出现中国的缪尔、罗斯福和斯科特。”是癌症逼迫我们，要珍惜生命，要珍惜时间，要黄昏赶路，要发挥能量，著书立说已经不够了，与其坐而论道，何如言传身带。马霞非常热衷于这个行动，但她已经不可能同行，作为赞助，她立即拿出一万元。

马霞是个非常沉着的人，非常坚定的人，气质非常高雅又自视非常卑小的人。原来我只是从生活上和工作上来观察她。她放弃纽约高水平的生活，

把余生全部贡献给中国，她的工作又好又快，编辑部的同事说她的工作量能顶3个专家。不论到哪儿，她都能和大家打成一片，从不摆外国专家的架子，按时上班，给大家打开水，有时候还打扫厕所。外文出版社曾评选她为先进工作者。除了工作需要，她陪我去过一次美国以外，14年没有享受过一次探亲假。她穿的是中国早已过时的衣服，吃的是馒头和火烧，骑的是飞鸽牌自行车，戴的是上海产的手表。这些年来在中国遇到不愉快的事也不少，但她从来不发牢骚。别的专家来中国一年两年，回去就可以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她说：“在中国的时间越长，这书越写不出来。”可见，她对中国的认识和情感是深沉的，但我从来没有看到她在西方同胞面前以“中国通”自居，也没有听到她发表过这方面的高谈阔论。

现在，从生命的最后考验中我进一步认识了她。癌症的折磨不断袭来，但她安如泰山，照常生活、锻炼和工作。她读书，听音乐，看世界网球赛现场转播，整理家居。自从今年一月确诊癌症以来，她共阅改了五部著作和大量的文稿，有时候她也偷偷趴在床上，或者躲在厕所里清理浮肿破水的创口，但从来没有皱过一次眉，喊过一次疼。她骨瘦如柴，一阵风就会被吹倒，但她的意志，真如铁打的金刚。她对待癌症、死亡、事业和人生的态度，给了我深刻的教育，逼迫我思考更多的问题。

著名诗人熊鉴读了《环球绿色行》以后，写了一首诗：“草木原来最有情，为生而死为生生。天人互爱时方泰，物我相戕祸乃成。屡向荒沙寻故国，频惊恶水逼危城。欲知世界存亡事，请听当头棒喝声。”

最初我对其中“为生而死为生生”这句不理解，现在我开始懂了，从生命的延续、生物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来看，生和死的意义都是重要的，积极的，有价值的。生和死，都是物质、能量和智慧转化形式，因此也是种群强化、物种进化和社会进步的阶梯。我联想到大马哈鱼的死，它们不避千辛万苦，长游万里，天敌拦劫，精疲力竭，最后粉身碎骨，把一切献给了“生”，所以它们成了生物世界中最顽强、最旺盛、最壮观的一种生命现象。推而广之，一个森林顶级群落的形成，一个高等动物的诞生，一个人类社会的成熟，无不是无数“死”的奉献。

所以，当我们从X光胶片上，从医生的眼神里，从化验的结果单上，面对着一个一个不可逆转的可怕信息的时候，没有掉泪，没有叹息；也没有慷慨悲歌，没有豪言壮语；但有纯真的爱、无语的默契、理智的哲学、真挚的追求。希望我们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不只是一点物质，还有一点精神的东西。云南之举有人不理解，问我：“这个时候，你怎能远行呢？”我说：“这正是我们向命运挑战的一种姿态。如果没有这个严峻的现实，我们可能还没有这种紧迫感和拼搏感。”这个严峻的现实，是指我们两人目前的处境，又何尝不是大自然的处境。现在地球得了癌症，而病源在人，这也是许多人还没看到的一个现实。

真正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离绿色营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而马霞的病情越来越重，特别是扩散到肝部的病变发展很快，本来就瘦弱的身躯眼看能量消耗殆尽了。7月20日忽然又犯急性肠炎，一个健康的人也经受不了这种折磨，她更是全身衰竭了。一个生性顽强的人到了这个地步，我真为她难过。

晚上，我们开了一个家庭会，讨论两个问题：一是马霞要不要住院；再是我要不要去云南。马霞一向是反对住院的，但今天没有反对。我想有两个

原因：一是她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生活的能力；再是她不住院，我不可能去云南。关于我去云南的问题，她十分坚定：去！

我激动地说：“我是人，人是有感情的。这个事情再伟大，我怎能在这时候离开你？”

孩子们哭了，我没有哭，她没有哭。她平静地反复说：“你应该去，你做了那么多工作，全准备好了，你应该去，你应该去。”

不只是她，孩子们也听从她的意愿，都支持我去云南。只有小女儿始终沉默不语。

我追问：“小南，你的意见呢？”她抬起头来，对马霞说：“妈，您真的愿意爸走吗？”马霞带着微弱而又坚定的口气说：“是真的，他不去，我会不高兴的。”我明白她的意思，但汉语表达不出来，就用她听不懂的成语补充了一句：“她的意思是，如果我不去，她会死不瞑目。”于是决定由女婿联系医院，星期一就住院。会上我提议，除了马霞，都要去参加大学生绿色营的开营式，请假也要去。我的意思是让孩子们从关心这次绿色活动中体验我们的心情。

第二天，马霞对我说：“昨天小南不说话，一定还有什么想法。”我又给小南打电话：“马霞说你一定还有什么想法，是吗？”小南说：“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只是为妈难过。这时候还让你走，她太亏待自己了。”

马霞的精神感动了我，我们的行动感动了社会。

我专为绿色营写了10首歌词，78岁的老音乐家宋扬先生读了以后，当天就谱了其中的一首。过几天，意犹未尽，又谱了一首。以后又有4位作曲家谱了5首。北京电视台东芝动物乐园编导高振兴先生听说我们经费有困难，主动资助了2万元，没提任何条件。还有一个单位也捐助了2万元，还不愿意宣扬名字。连续3年在白马雪山考察滇金丝猴的美国学者柯瑞戈也捐献出自己的野外装备和人民币1000元。养蜂专家周崧也捐助1000元，我感到这是专家一个月的工资，其意义比企业出十万八万还重，所以领了情，但钱谢绝了。云南也传来信息，德钦县欢迎我们，特别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把接待我们作为今年的主要任务之一。营员学生的家长更是积极，有的捐助药品，有的捐助生活用品，有的帮助复印宣传材料，有的帮助学生修改中心发言提纲，还有位家长邀请部分营员座谈如何搞好调查的问题。就是这样群策群力，才组成了这支将近40人、远征白马雪山的队伍。

出人意料，马霞还同意在开营仪式上做一个录音讲话。为了保证录音的质量，我还特请北京广播电台的记者来完成这个任务。

悲壮的号角

7月25日是绿色营出发的日子，我一早起来，整理行装。6点40分电话铃响了，一个万万没想到的噩耗从医院传来：马霞刚刚去世了。当时我第一个念头是感谢上帝，她没有经历痛苦。

许多人告诉我，癌症的痛苦是非常可怕的。这种信息一直折磨着我，比自己得了癌症还痛苦。我暗地里给她准备市场上买不到的止痛药，经常观察她的表情是不是已经面临到痛苦的阶段。住院的时候，医生问我：“遇到危急情况，要不要采取插管等急救措施？”我坚定地回答：“不要。”

感谢上帝，上帝是爱她的，现在她突如其来地异常平静地走了。昨天，

她好像还好了一些，虽然是生平第一次，但还适应医院的生活，上厕所、吃饭、漱口、擦身子都有特级护理；而且她很喜欢这两个来自农村的姑娘；吊针输夜以后，脸上出现了红晕；她还告诉我，上午做了“B超”。当时她睡得很死，做“B超”都不知道，醒来还问：“什么时候给我做‘B超’？”当时我一点没想到这是严重的征兆。下午还接待了三起客人：两位亲戚，一位作家，一位在家护理过她的护士。还对我说：“明天绿色营学生要见我，给我带把梳子来。”我告诉她：“明天中央电视台只跟绿色营到石家庄就返回来，31号再乘飞机去追他们。我也准备这样，可以多陪你几天。”她没有做声，但从表情可以看出来，她很高兴这个决定。

50路末班车时间快到了，和昨天、前天一样，我们平静又温情地说了声“再见”，就分手了。

当我再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不要她走，我不愿意看到她那失去了表情的脸，我把白色的床单掀起，覆盖了她的头。窗台上摆着四束花，都是亲友们送的，我挑了最美的一束放在她的左侧，和她说了最后一句话：“现在你可以和我们一起去云南了。”

下得楼来，女儿帮我背好旅行包，一行走出门。车上的同学们全然不知道在院所发生的一切，看见我们走近，都热烈地鼓起掌来。我沉重地走上车，示意同学们坐下。

我真不知道怎样把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情告诉大家。从今天早晨以来，我没有叹息，没有伤心，没有流泪，但此时此刻，面对着这些年轻、纯洁、真挚、热爱自然、热爱未来的心灵，我再也控制不住了，眼泪喷涌而出。我强忍三次，最后才说出一句：“同学们送的鲜花，马霞已经不能亲手接了……”

车厢里一片寂静，有几个女学生哭出声了。以后我说了些什么，我也记不清了，后来从记者的报道中知道，我说的是在马霞床前说过的话：马霞将和我们同行。

火车出发的时刻已经快到了，但谁也不知道该怎样结束这个悲壮的场面，最后还是我大声地说了一句：“开车！”

61次特快列车行驶了一段，广播里传来了绿色营特制的录音节目，主要是宣传环保的内容，刚好里面就有一段马霞在开营式上的录音讲话。那么熟悉，那么平静，那么亲切，可她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不，她和我们同在。她就在我们身旁，她和我们同行，和我们一块儿去白雪山。这个录音讲话中不是还有一句：“我的思想将一路上跟随你们。”

我和学生分散到各个车厢收拾垃圾，搞旅客环境意识调查，并接受中央电视台的访问。很快全列车都知道了，北京上来了一个大学生绿色营。列车长非常感动于我们的行动，特别前来道谢。我们感谢列车长的支持，还特地送她一本《环球绿色行》，我在上面的题词是：“希望61次列车成为绿色列车。”8小时以后车到邯郸，我才下车。回到北京，办理马霞的后事。

遵照她的遗嘱，没有通知任何亲友，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由我和孩子们把她的遗体护送到八宝山火化。只有自然保护作家沈孝辉，也是晚走的绿色营成员，坚持要代表绿色营一同去了。我们都沉默不语，只是把一束鲜花放在她的身上，代表我和大家对她的爱，随着她的灵魂一起升向天国。

与我们同在

7月30日，我和电视台记者、几个晚走的营员又乘飞机到昆明，追上了队伍。听说有几个人闹矛盾，不团结，主要是这些学生单纯、幼稚，有几分自负，还有社会给予他们的不良影响。许多营员感到群龙无首，急切地盼我到来，随营作家哲夫也对我说：“这里太乱，要不是等你，我真想走了。”我安慰他说：“这是90年代的青年，不是50年代的青年。”

在全体营员的见面会上，我深情地对大家说：“几天不见，我很想念你们。听说在我们集体里有意见分歧，这是正常的，不足为怪的。只要我们高举绿色的旗帜，通过民主的办法和实践的办法，总是可以解决的。”

为了帮助同学们搞好团结，我朗读了马霞的一段讲话：“在你们共同相处的一个月中，你们将彼此学习。无论是处理人和人的关系，还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从寻求自身正确位置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一次极其难得的经历。你们首先要学会用欣赏的眼光去认识别人，然后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在以后的会上，经常有同学引用这段话。可见马霞这些话对大家是多么重要和多么需要。

在白马雪山考察期间，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现象。这时候正是滇西北山区的雨季，对下雨我们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我们很少碰到雨，即使有雨，也多是夜间或者乘车的时候。特别使人振奋的是，这时候很难看到白马雪山和梅里雪山的巅峰，有些旅游者等了20多天也看不到，我们却都看到了，好像一切都准备好了。有人说这是世界最美的山峰，因为阻挡着来自印度洋的暖流，终年云雾缭绕，难识真面目。今天她完全揭开了面纱，露出了那神圣、端庄、美丽的笑容。年轻人在奔跑，呼喊，拥抱，老夫也骤发少年狂，我大声地高呼：“白——马——雪——山——，我——们——来——啦！”声音震天撼地，引来许多的照相机和摄像机，记下了我和白马雪山渴望已久、终于会面的喜悦。

兴奋之余，北师大博士生张立悄悄对我说：“是马霞在等待我们。”

中国日报记者史立红说：“马霞在云端看着我们呢。”

还有几个同学不约而同地告诉我，是马霞在保佑我们。

我的心情也和他们一样，希望马霞和我们之间的精神联系，能产生物质之间的感应。很奇怪，我每次出门大小总要出点毛病，如腰痛、牙痛、肠炎、感冒、摔伤等等，这次我却什么毛病都没有，是不是马霞的精神感应在我的身上发生作用呢？

8月6日登明永治冰川，乘车到澜沧江边以后，还有很长一段险峻的山路，县里特为我备了一匹马，还派了两个身高力大的学生前后保护我。我下定决心不骑马，而且奋力走在前面。

少年躲日本鬼子，中年劳动改造，晚年跑自然保护区，我有一辈子的爬山经验，再加上来之前，我做了充分的准备——每日爬一百层楼，所以我走得比较轻松。我们这个竞争中组合的7人小分队一路领先，但“行百里者半九十”，到离目的地还有最后几里地的时候，我感到气力不支了。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马霞死不怕，癌不怕，我还怕什么。精神是可以变力量的，年轻人感到惊奇，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哪来的这股劲！两位从未爬过高山的女同学也有一个念头，唐老师年龄比我大两倍，怎么也不能拉下。还有两个体力强的，本来可以超过我的，但情愿把荣誉让给我，一直让我排头。这样经历了4个小时的攀登，终于在下午6点到达了目的地——濒临冰川的太子庙。

最后一批是8点到的，比我们晚了整整两小时。“唐老师第一”就成为

当时的一段佳话。

高山的祭奠

第二天，从德钦返回中甸的路上，我们要翻过一个海拔 4300 米的垭口，这是我们此行的最高点，也是我迄今登山的最高点。我和电视台摄制组乘坐的小车走得比较快，就停在这里等待大车的到来。

藏民们是很崇拜山丘的，差不多在每个制高的风景点都设立了他们的“玛尼堆”：用山石垒砌的塔，烧香台以及五彩缤纷的经幡。这个地方面对白马雪山，四望云山万里，遍地山花烂漫。

此情此景，我想起了昨天收到的关于给马霞献花的信，便走进了山顶高原。这里真是一个花的海洋。尽管花型比较小，但千姿百态，万紫千红。这是马霞最喜欢的花。山花的本性正是马霞的气质，她闪耀在千万朵、千万朵之间，非常顽强，非常美丽，也非常渺小。

记得 11 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俩漫步在青海湖边，她被高原的野花陶醉了。她从来不允许我为她拍照，只有这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她主动要求我拍一张她欣赏野花的照片。那也是我们认识 3 年之后，面对着蓝天、白云、高原、湖泊以及烂漫的山花，第一次定情的日子。想到这里，我再也看不清眼前的野花了，泪如泉涌。我单膝跪下，面对着白马雪山放声痛哭。不能再忍了，我要把这半个月、半年的眼泪都倾泻出来。

过一会儿，我意识到敏感的电视台记者已经跟踪而来，默默地站在我的身后拍照。我擦干眼泪，站起身来，选择了我认为最美好的山花，采摘了 10 朵。我觉得有必要向记者解释一句：“我从来不摘花的，这 10 朵花我准备带回北京放在马霞的骨灰盒里。”

大车到了，这个信息很快传感到每个人，他们都默默地走进草地，都违反着共有的道德和纪律在采摘自己最心爱的花。有人走过来搀扶我，有人把花塞在我的手里，有人在我旁边擦拭眼泪，谁也不说话，都默默地向“玛尼堆”走去。

这时候陪同我们的藏族工作人员根据他们的民族习惯，已经采来一些香柏，在烧香台上燃烧起来，还大声念着为马霞祈祷的藏语。

不知谁说了一句：“为了纪念马霞阿姨，我们默哀一分钟。”本来就安静的大地更安静了。天不说话，地不说话，鸟不说话，昆虫不说话，人更不说话，都在纪念来自地球的另一边的这位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她带给中国人民的，不只是 15 个春秋的默默奉献，不只是西方优秀的文化和精神，而且还有用她的生命在这些年轻人的心上播下了绿色的种子。

在带着香味的烟雾缭绕中，我不知道这些年轻人在思考什么，但我感觉到他们在严肃地思考，思考的时间很长。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最后还是我抬起头来，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马霞有遗言，她死了以后，不要搞任何仪式，但是，今天在海拔 4300 米的高山上，谁也没有约会，举行了这样一次发自内心的特殊祭奠。我谢谢大家！”

亲爱的马霞，安息吧！愿你像山花一样，永远开放在这个世界上。

风餐露宿帐篷里，八千里路云和月。

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董德福的一句话，对我们这次行动给予

了一个崇高的评价：“60年前，共产党组织了一次革命长征；今天，你们组织了一次绿色长征。”

是这样的，绿色营的愿望正在逐步实现，他们正在中国这块急需绿色和民主的土地上，播种着星星之火……

傅清涛身患严重的残疾，又生在贫穷的农家。如若不是靠自身的努力，他可能要寄生于他人，也可能沦为乞丐；他可能终身孤独，享受不到天伦之乐，更何谈事业有成！然而正是靠着不向命运低头的韧劲和向着人生目标尽力拼搏的精神，他才九死一生，他才干出了健全人都不一定干成的事业，赢得了学生、家长、村民的由衷信任与爱戴，从而使自己的生命在事业中得到了升华，得到了本不一定属于他的一切。如果说人生是一场赛事的话，他在这场赛事中超水平的发挥，使他的人生之旅由充满荆棘到柳暗花明。

在女娲诞生的地方

安俊芷

巩义，这里有日夜流淌的伊洛河绕村而过，汇入浩瀚的黄河；这里有传说中的补天女娲的诞生地——巍巍邙山；这里有静静地依偎在笔架山下的唐朝大诗人杜甫的出生地；这里有庞大的北宋皇陵陵墓群……

这次采访不比往常，似乎有一种冥冥大千世界之外的东西，导引着我千里迢迢，独身前往巩义市孝义镇孝北小学，去看望、去采访、去探询傅清涛——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轮椅上的校长”。

人生的喜悦，在于做了别人办不到的事

他没有像我想象中的那样瘫坐在轮椅上，而是用他那双患有严重小儿麻痹后遗症的双腿努力支撑着高大的身躯，一只手撑在办公桌上，另一只手尽力向我伸过来。一头微微卷曲的花白头发覆盖着他那张历经忧患、饱经沧桑的脸。一对细长的眼睛凹嵌在隆起的眉骨下，笔直的鼻梁，宽厚的嘴唇，组成一幅标准的中原男子汉的肖像。

或许因为是头次见面，或许是因为在一位女记者的面前，也或许是因为执教 39 年的他从未在人前讲过自己如何如何，憨厚、纯朴的傅校长略显腼腆。我一边记录着他的“履历”，一边盘算怎样让他沉浸于一种回忆、进入一种激情。在他几乎与我同时进入一种创作状态中，一群仪表堂堂的五尺男儿似天兵神将从天而来……

他们都是傅校长当年的学生。

似乎是上帝派遣傅老师的门徒们为我打了前站，他们是从四面八方聚到巩义市里出席总结表彰大会，顺便来看看老师的。半米高的奖杯躺在他们的后车厢里（我放行李时看到的），然而他们谁也没有向老师炫耀什么。见到老师时没有寒暄，没有握手，亲得就像天天回家的儿子走进家门来到父亲面前一样。此时，这个磁场里传播的信息绝不仅是浓浓的师生情，还有深深的父子情。看着这一群晃晃悠悠的小伙子，傅校长那不知说什么好的憨劲和满脸笑容，分明流露着他沉浸在一种天伦之乐的享受之中。

从午饭到傍晚，这些年轻人一直在说傅老师，他们说不尽道不完。

我们这一群人后来都上了大学，学习基础当然是傅老师打下的。文革后期那么乱，只有傅老师的班要求严。傅老师在家族中排行第七，村上人信任他，都说“只要七儿教着哩，就没事！”其实我们从傅老师那里学的代数、几何是有形的，也是有限的，真正无形、无限的是他的爱人之心和他的拼搏精神。我们这几个有的并不是他班上的，而他同样愿意管我们。他的床上常

年睡着学生，吃住和他在一起。全校穷孩子的头发都是他理，有时一天理二三十个，腿都肿了。他对学生、对事业的爱是崇高的，无私的，从不求回报啥。别看傅老师走路十分困难，可他那时当班主任、教导主任，教毕业班数学，指挥宣传队排样板戏，带队出去慰问演出，还带出一个中南五省篮球邀请赛亚军队！

我在给市长当秘书时，市长们都问我原来是干什么的，问我的工作精神是从哪来的。我告诉他，我差得远，如果有我老师工作精神的一半，什么都能做好！

我们核桃园乡虽是山区，重教却是有名的。我负责教育方面的工作，发展教育是我理所当然要干的事，干得怎样，这与个人素质有直接关系，我的个人素质有许多方面都受傅老师的影响。心中有我们傅老师，干什么都有一种拼搏精神。我一抓教育投入，教育附加不截留，二向老师们宣传傅老师的爱心和拼搏精神。去年中招，我们乡升学率、毕业率、合格率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是我职责之内该干的事，咱不想别的。这就是傅老师讲的，做人就该是这样做人。

傅老师没当过我的班主任，只给我上过课，可我跟着傅老师8年，和他吃住在一块，感情就和父子一样。那时我家8口人一孔窑，哪有睡觉的地方！从我懂事时起，就没在家住过。记得傅老师没有节假日，没有午休，工作总要到晚上12点以后。可能是他的腿难受，他工作时总是坐一会儿，跪一会儿。我当年是淘气包，他让我在宣传队演匪兵。后来推荐我上高中，因社会关系的原因，没能如愿。傅老师帮我联系，给我辅导，推荐我到远点的中学上了高中，后又上了大学。没有傅老师，怎有我的今天。

……

天傍黑了。落地灯桔黄色的光线在傅校长身上勾出了一道金色的光圈。不知为什么，我脑海中浮现出山东曲阜的孔府，高大的杏树下，布衣孔子的身边团团围坐着子贡、颜渊、冉有、子路……耳畔回响着“贤人七十，弟子三千”……

苦难是人生的老师，通过苦难，走向欢乐

坐在自己亲手设计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凉亭中，看着美丽的校园，看着自己的一批批学生，抚摩着9岁的娇女，端着妻子送到手中的最爱吃的蒜面条，傅校长的目光中都流露出由衷的欢乐。这欢乐对别人来说也许很平常，然而他却得来不易，这欢乐的背后，包含着他的几多辛酸与苦难。

1941年，傅清涛在孝北村一个贫苦的多子女家庭降生。穷人的孩子生下来就顺风长吧，谁想到灾难却偏偏降临在他的头上。3岁那年，一场持续不断的高烧使他奄奄一息。妈妈焦容满面，整日守候在儿子身旁，奶奶心痛地劝慰：“不中啦，别守着，扔了吧！”母亲舍不得，哪怕有一口气，母亲也舍不得呀。结果，他熬过来了！只是醒来后双腿都不会动弹。妈妈把他抱起来，两条腿嘀里搭拉的像两根粗面条。本来就穷；再添上残疾，雪上加霜，儿子这辈子怎么过啊！母亲不知掉过多少泪。

苦命的傅清涛还算赶上了好时光。1949年全国解放，他居然有了学上。8岁上学，上下学往返要走二三公里路，他靠姐姐拉着拽着，看着同学们奔跑如飞，心中好痒痒。他多想自己也能跑起来呀！可他站都站不稳。没人看

见的时候，他索性趴在地上嗖嗖地爬。十几岁的时候，他居然一步三晃地迈出了步。

贫穷、苦难、压抑、孤独伴随着他的童年，有一件事却令他终生难忘——那是一篇儿时的日记：

今天早上醒来，大雨倾盆而下。我戴上草帽，像往常一样和姐姐走出家门。村里的路烂得像黄酱，几道沟几座坎都被雨冲得像冰一样滑。姐姐自己也摔了跟斗，我只好把书包塞在腰里，跪在地上一步一步爬。今天我不仅是个瘸腿孩子，还成了一个水孩子、泥孩子。但是我很高兴，我终于在钟响前坐在了教室里。

这篇日记被老师看到了，在给全班、全校同学读后，还把它登在了学校的黑板报上，号召同学们学习傅清涛热爱学习的品德和坚强的毅力。

这件小事给一向自以为矮人三分的残疾孩子傅清涛以极大的鼓舞，甚至是刺激。他就像一张拉满了弦的弓，绷得那么紧，时时事事都要求自己做得最好。

1958年，傅清涛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省重点——河南省巩义市第二中学。由于残疾，他被取消了升入高级中学的资格。

伊洛河静静地从村边流过，年复一年地朝着女娲诞生地邙山奔流，而后依旧汇入古老苍茫的黄河。

唯有傅清涛眼前的一切都变了。成为一名护青社员的傅清涛，手握镰刀躺在庄稼地里，任凭泪水顺着眼角向大地流淌。他想念亲爱的老师，留恋简陋的课堂，割不断与那浩瀚的知识海洋的情思。春华秋实，做个农人也好，可自己连做个农人的资格也不具备。

脚下的路怎么走，人生之旅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

当大地又是一片金黄的时候，傅清涛的老师满脸汗水，急火火地找到了他，并给他带来了天大的喜讯。几个月来，老师一直记挂着自己的学生，为他四处奔波，也因他成绩好，终于为他谋到了一份公办教师的工作！

长时间悲观绝望使傅清涛眼前一片昏黑，老师带来的好消息如一缕穿透云层的阳光，把他眼前照亮。傅清涛啊，怎样干才能报答老师、报答社会、报答党给自己的机会！这是实现生命价值的起点呵！

1959年，傅清涛工作的第二年，便获得了巩县（巩义市前身）先进工作者称号。他以校为家，教算术，教语文，担任团支部书记，还自学音乐，用一条稍有点劲儿的腿踏着风琴，让歌声第一次飞出村小的校园……年轻的傅清涛用自己的青春编织着生活的梦。

就在他以满腔热忱投入工作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后的1962年，领导号召公办老师还乡教书，等国家经济状况好转后再回原校工作。傅清涛作为团支部书记，主动申请回到家乡孝北村当了一名民办老师，每月由村上补贴3元、5元、8元，一干就是26年。傅清涛说：我能有一份工作，能在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能和可爱的孩子们在一起，有钱没钱都乐意干、一样干。

傅清涛的心是热的！然而生活是严酷的。

35岁上，傅清涛才在家人的撮合下娶上媳妇。那女人带来了3个孩子，傅清涛没生一儿一女。8年的婚姻，从头到尾充满了凄苦。靠傅清涛当民办

教师那菲薄的收入，一家人的生活难以维持，他又不能下地扶犁使牲口，妻子的负担是沉重的，日子艰难而清苦。对这些，傅清涛自觉愧疚，他对妻子是宽容的。清苦而艰难的日子使这个家一年至少有 300 天是吵吵闹闹的，但只听女人叫喊，从来没有男人的声音。贫穷没有头，傅清涛的精神磨难也就没有头。他终于扛不住了，提出了离婚。傅清涛太伤心了！妻子责骂什么都可以忘掉，唯有两句话，只要提起来，他的心就淌血——“你真中，真能！你咋还是个民办教师？你真能干，咋不娶个大闺女！”是啊，自己就是个民办教师，也许注定了这辈子都是民办教师。民办教师被人看不起，也别连累人吧。

分居的那一年，傅清涛也曾回过家，每每走到家门前，便又折回学校，他宁肯一人独居在学校那孔被烟火熏得黑黢黢的窑里。他要干民办，他受不了那永无休止的精神折磨！

妻子终于带上 3 个孩子走了。傅清涛望着他们母子 4 人远去的背影，还是落泪了。“再吵再闹也是个家，孩子们是很可爱的，她也有通情达理的地方，每次来学校吵闹，但只要学生们一来教室上课，她就会走开……”

妻子走了，学校工作又非常忙，中午要赶着做点饭，从没做过饭的傅清涛手忙脚乱。一次蒸馒头，他想蒸馒头多慢，何不直接放水里煮。他把发面拍成饼，放到水里煮，结果煮了一锅酸糊糊，只好喝了两碗酸糊糊，又去上课了。

除夕，可怕的除夕！傅清涛一生坎坷，可却从来没有孤独过，他身边永远团团围着学生。只有除夕，孩子们必须回家过年，因为团圆是中国人的习俗。这一天，多少学生、多少家长来请他去过年，他心口窝热乎乎的，但他一一谢绝了。他不愿给人添麻烦。每送走一拨学生，一位家长，心里又酸酸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孤灯守岁，他想起了自己的妈妈、哥哥、嫂嫂，也想起了她，还有 3 个孩子……后来，傅清涛还是被自己教过的已经娶妻生子的学生，抱上自行车，“强行”接走了……

悲伤的时候，工作就是良药

一天、两天，第 12 天时，傅清涛骨折的右腿结束了牵引。那是 1986 年，他出任孝北小学校长时的事。一栋危楼像悬在空中，师生进出楼得爬几节用砖头和石头堆起的台阶；老师上厕所去村民家，女生钻庄稼地，男生找墙角；楼前堆的垃圾像一座小山。傅清涛一上任，首先带领全校师生改建校舍，豁着命干。铲平了垃圾山，清出了一块操场，整修了教学楼，建了厕所，还修建了太阳能浴室。他是校长，他要拼命干，他又是残疾人，同样的工作，他要数倍于正常人的艰辛。超负荷的工作，终于把他拖垮了。一天，站在办公室门口，他突然摔倒了，稍稍能吃点劲的那条右腿别在台阶上，顿时不能动了。拉到医院，被确诊骨折。傅清涛请求医生让他回学校，在办公室打石膏，做牵引。他说，他是校长，校舍正在建设；他是刚上任的校长，学校百废待兴；他是毕业班的数学老师，孩子们正处在升学的关键时刻……医生破例在学校给他做了手术。

本来就不中用的双腿，又加上骨折的巨痛，傅清涛一步也动不得。他让学生找来两个木墩，用手撑着，拖着残腿、伤腿，一点点一点点挪到办公室门外。他让人支起一张行军床，把双腿平放在床上，就这样，他把毕业班的

学生们招呼到床边，围坐一圈。有的孩子没见过石膏打在腿上，轻轻地摸着老师的伤腿。有的孩子心痛地问着老师：“痛吗？”傅清涛忍着疼痛故作常态，平缓地说：“没啥事，老师的腿已经快好了，我们上课吧！”蓝天下，傅清涛深入浅出为孩子们讲解数学应用题的声音，清晰地传到田间乡野。孩子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们明了的何止是一两道数学题，深深印在他们心间的更有做人的道理。什么是一撇一捺大写的人？他们敬爱的傅老师、傅校长以自己的行动为他们做了形象的诠释。那一年，孩子们在作文中，几乎都写过他们敬爱的傅老师，这些孩子也无一不顺利地升入初中。

自打站在讲台那一天起，傅清涛的报恩思想就一直占据着他的整个身心。再加上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残疾人，再怎么努力，也会因腿脚不利索给人带来不便，给工作带来损失。所以他再怎么努力，也还觉得欠党的，欠学生的，欠家长的……

任何一位有良知、讲究职业道德的老师，似乎都有一个通病，只要在学生面前，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只要往讲台上一站，饥渴劳碌就没有知觉，烦恼忧愁全抛到九霄云外。傅清涛也不例外。

清贫的物质生活和腿的疾患给他的生活带来许多不幸，反过来傅清涛又在民办教师的工作岗位上感受到无限的乐趣。无论主客观条件，都使傅清涛感到劳动已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他的写在办公室、宿舍、备课本、工作笔记本的座右铭无人不晓：“第一是工作，第二是工作，第三还是工作！”

一次，有个学生几天没来上课，他怕孩子被迫失学，不放心，就在课后去家中拜访。真被他猜中了，家长看到傅老师这么困难，一步三晃地走到家来，很受感动，打消了让孩子辍学的念头。就在这时，天上飘起了雪花，家长请傅老师避避雪，过会儿再走。雪越下越大，第二天还要上课，傅老师不能久停，家长就让孩子陪傅老师一起回学校。一路上，狂风卷着鹅毛大雪打着圈圈，铺天盖地。本来走路就掌握不好平衡的傅老师走在雪地上，更是打滑，不知摔了多少跟斗。走上一座陡坡时，平常都困难，现在只好爬。学生说：“傅老师，您别着急，我在前边拽着您。快要爬上顶的时候，没想到学生脚下一滑，砸在老师身上，师生俩一块像坐滑梯一样，溜到了沟底。学生感到愧疚，老师反而为孩子掸掉身上的雪，安慰着说：“没啥事，没啥事。”第二回，学生说：“老师、您在前边走（爬），我在后边推，我就是摔倒了，也不会把您再砸下去”。老师脸上笑了，心里却在流泪，多懂事的孩子！就这样，师生俩连滚带爬，成了两个雪人，终于回到了学校。

进了家门，窑里黑乎乎的，火早灭了。生火又没点得着的干柴，于是抖抖雪，师生俩抱在了一起，靠彼此的体温取取暖，就这样酸酸地甜甜地睡着了。

这是一段并不久远的故事。傅清涛在第三次带领师生建校中，不仅殚精竭虑，而且付出了血的代价。

当时，孝北村经济效益还不是太好，但村委会还是决定拨款 43 万元为小学盖一栋教学楼，这不能不说是全村父老倾其所有支援教育，也不能不说是孝北的村民对傅清涛的信任。

傅清涛把这笔资金全都用在原材料上，拆旧房，清渣土，建楼房，打小工，拄着拐杖，他指挥师生一锹一锹铲，一筐一筐抬；他走村串户，一家一家动员，出工出力参加建校；为院墙、为校门、为学校其他辅助设施，他不得不以病残之躯，四方游说，争取乡镇企业的赞助。

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他拖着疲惫的身体，摇着他那辆残疾人三轮车，从一家乡镇企业走出来，没走多远，只听身后轰鸣，一辆吐着黑烟的大型拖拉机向他狂啸而来，他眼前一黑，就被黑烟吞没了。醒来时，他的头成了一个血葫芦，五官都辨不清了，满身是血。拖拉机早跑得没影了。围观的人群中，挤出来两个年轻人：“这不是俺傅老师嘛！”赶紧把他背到了镇医院。伤势太重，医院治不了。这两个早年毕业的学生急中生智，给傅老师的已任镇政府办公室主任的学生打电话。傅老师连夜被送到了郑州市一家部队医院。医生了解情况后，很为老师能有这样的学生，能有这样为学生敬佩的老师而感动，马上组织专家会诊。原来傅清涛大脑未受重伤，只是被拖拉机掀掉了一片头皮，大量失血。傅清涛听见了，他对医生说：“大夫，您不必考虑以后好看不好看，我这人对这不在乎。手术怎么简单就怎么做，俺只要尽快回巩义，回孝北，回学校，后天星期一，还有毕业班的学生等俺上课哪！”手术一做完，傅清涛坚持不住院，又连夜赶回了巩义，赶回了学校。

星期一，他居然站在了讲台上，头上缠满了绷带，肿得就像扣着一个小锅。他利用课后时间换药、打针，硬是没落一堂课。

校园建设呢？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除村委会投资43万元盖起新教学楼外，他竟摇着那辆轮椅，四方化缘，筹款近20万元，翻修了另一栋旧教学楼，还盖起气派的校门，铺了甬路，修了花坛，盖了厕所，买了图书，添置了教学仪器……

傅清涛上课是老师，管理是校长，在花坛中侍弄花草是花匠，放学后刷厕所是清洁工……他爱孝北小学的师生，他珍惜这里的一草一木，他为这里抛洒血汗，他视孝北小学重于自己的生命。

人的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你能把感情贡献给人们，而人们也能同样地对待你

一辆小车在绵延起伏的山道上疾速行驶，它要开向距巩义市十几公里远的山区大浴沟镇。车上坐着两个人，他们是傅清涛早年教过的学生。此行是专程进山，去为自己的老师相亲。

谁提的亲？是傅清涛的学生家长。学生牛国栋因为淘气，被原就读学校赶出来后，孝北小学收留了他，傅校长把他带在自己身边，同吃同住，生病时，又喂饭又喂药，学生进步很大，后来考上了化工厂技校。学生和家万分感谢傅校长。家长说，这么好的老师，怎么不能帮他成个家呢？于是这位家长费起了心思。

傅清涛被村上人誉为“教育功臣”。老一辈人是看着他长大的，同辈人中不少是他学生，学生的子孙又是他的学生。他身残志坚，自强不息，能吃常人所不能吃之苦，能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之磨难，他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孝北村村民子孙后代的教育上，村上人是有目共睹的。人们尊重他，也关心他，特别是他的婚姻，成了村上人的一件心事。

我们中国人是最善良的，最喜欢皆大欢喜的故事结局。或许真的是苍天有眼，是傅清涛这样的好人，在他遍尝了人生苦果之后，上天要把人间的一切美好都恩赐于他。

11年前的春天，蜿蜒的山道上行走着一位高高大大的中年妇女，路边的花草在春风中摇曳，仿佛在热烈地为她送行。新生活正在向她招手，使她不由

地加快了轻盈的步伐，她就是傅清涛现在的妻子赵金凤。

赵金凤生着一对双眼皮大眼睛，一开口便面带笑容，慈眉善目，50出头的人了，双颊还红扑扑的。一见到她，便使人有一种感觉：她的丈夫好福气。

赵金凤前夫去世时，她的小女儿才一百天。带着4个孩子和瘫痪在床的婆母，她一个人挑家过日子苦熬了十来年，直到把婆母侍候去世。

说起她和傅清涛的婚事，说起当年她为什么选择了傅清涛，她的话语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她说：“两人过日子总比一个人强。”多么理智！她说：“咱有4个孩子，人家不嫌咱，帮咱一起带，咱能为人做啥？还能再嫌人家！”多么宽厚的胸怀！她说：“俺没和婆家人商量，只和俺爹说了一声，这事就自己做主了。”多么有胆有识有主见！她说：“别看他腿不得劲，可这人心好。”心有灵犀一点通，她能看到他心好，并珍视这一点，这便成了他们日后共创美好生活的坚实基础，他们是一对好心人！她说：“经济上咱和人家光比差，不比好，就知足。人要肯干啥都有，只要有人，就啥都会有。”她没有读过很多书，看问题却透彻达观，心明如镜，真是一位勤劳善良、精明强干的良家妇女。

村上人都为傅清涛高兴，以12分的努力支持这桩婚事，先后解决了赵金凤母女5口人的户口。转过年来，傅清涛还抱上了以前想都没敢想过的千金。

傅清涛对学生都爱如生子，对赵金凤的子女当然视同己出。赵金凤非常支持傅清涛的工作，傅清涛一早就去学校常常赶不回来吃饭，她便把米汤（粥）和馍送到傅清涛的办公室，或者让学生带过去，她知道他腿脚不灵便。每晚赵金凤都把烧好的热水端到傅清涛面前，让他泡脚。几十年来，傅清涛工作一天后，双腿总是肿的。在母亲的影响、教育下，长大成人的孩子们对傅清涛格外亲热、孝敬。大女儿给他做衣服，二女儿给他织毛衣。春秋着西装，冬天穿羽绒服，孩子们都给傅清涛准备得好好的。傅清涛出去开会，到分校去上课，都是孩子们早早起来，一直帮他推上残疾人车推上坡，走上平坦路，才目送他远去。

说起那辆残疾人车，是傅清涛的学生们毕业参加工作后，把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攒在一起，买来送给恩师的一件礼物。那辆车曾招来村上人多少羡慕的目光。坐在那辆车上，荡漾在傅清涛心中的是幸福，是甜蜜，是感激，是激励，是自豪，是骄傲，是难以用语言准确传达出来的情感。

赵金凤说：“别人家盖房，哪有不是男人顶着的！唯有俺家，他一天也没管过。”说这话时，语气中既有几分嗔怪，又有几分骄傲。去年，赵金凤在村上人和傅清涛的弟子们的支持帮助下，盖起了一栋两层小楼房。

但是，那小楼目前还空空的，傅清涛没时间过去。他整天在学校忙，起居室还是先前那孔黑黢的窑。没有冰箱，没有电视，没有任何一件现代化的家具，但这窑里充满了夫妻恩爱，充满了天伦之乐，充满了对未来更加美好的生活的追求、自信和向往。

人们常说：教师就像蜡烛，照亮了别人，熄灭了自己。傅清涛的故事却对“蜡烛说”有了一种新的诠释：在照亮别人的同时，放射出自身的光彩。这是因为他牢牢掌握了命运属于自己的那一半，还因为他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

“这个比赛是一个树立民族自尊心的战斗！”当回忆起柴科夫斯基国际少年音乐赛时，钢琴神童郎朗的父亲郎国任说：“日本人很看不起中国人，NHK电视台根本不给中国孩子镜头，集中报道俄罗斯人和日本的上原才子。上原确实很棒，夺冠呼声很高。但几轮下来不一样了，电视台开始把镜头对准郎朗，观众也把目光集中在郎朗身上。决赛时，整个莫斯科爱乐乐团专门飞到日本给决赛的孩子伴奏。乐团享誉世界，却对郎朗服服的。那指挥，即首席的微笑真让人舒服，观众也听得泪流满面。这个时候我走到了大厅的外面。我已经知道了结局，但我的感觉已经麻木了。”

为什么“麻木”了？你要知道，为了这一天、这一时刻的到来，郎朗和他的父亲曾走过了一条多么艰难的路程啊！

郎朗和他的父亲

沙琳

“北京的钢琴声都是从茅草房里传出来的。”

这是一个认识“钢琴神童”郎朗的人说的。我正和他一起寻找郎朗。

在西城赵登禹路下车，走进新开胡同，两边都是灰墙旧瓦，夕阳抹在屋瓦的衰草上，令人举步彷徨。这时，有一缕琴声在斜阳中传来，“李斯特的曲子”，那人很激动。顺着琴声，我们来到一个失去大门的四合院。

三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迎了出来。

有个孩子生得面广额丰、白皙硕壮，皮肤泛着光亮，我想他就是郎朗。他一双大眼睛给你的感觉很奇特，既像一个善于交际的成年人，又束不住稚气。他自自然然是中心，另外两个跟着他。

这是一个“音乐移民点”——孩子大人都是从东北或其他省来的，孩子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或附中，大人为了陪伴自己那有天分的孩子，丢了属于一个成年人的一切：工作、收入、工龄、劳保、朋友、环境……

这样的音乐移民点在北京还有不少，它们星罗棋布在破旧的民房中。

这是两间北房，是学钢琴的葑子藺和母亲租借的。郎朗每天从白纸坊的一座简易楼来这儿练琴，他说是投奔这儿的钢琴，但我觉得他也是为了和同伴玩耍。

三个孩子各持乐器一起给我们演奏，这是肖邦、柴科夫斯基、李斯特的音乐旋律，它在残旧的胡同中传得很远。

郎朗最显赫的成就，也即迄今中国人在钢琴上获得的最高奖项是：柴科夫斯基国际少年音乐比赛钢琴金奖。

“像他这样有钢琴才能的孩子，世界上大概只有三到五个。而有他这样家庭，他这样的老师，他这样环境的孩子，世界上只有一个。因而他得到了这一年的世界最高奖。”柴科夫斯基音乐大赛结束后，组委会主席、俄罗斯的谢尔巴克这样评价。

全家命运都担在了“音乐神童”的小肩膀上

一个40多岁的男人，一直静静地注视着一切，间或有分寸地微笑着，给人感觉坚毅而又有心计。

他叫郎国任，郎朗的父亲，前沈阳公安局治安大队警官。

“请给记者说说您辞职的经过！”我的同伴请求道。

郎国任挤出点勉强的笑意。同伴再次要求，前警官的嘴张了张：“说点别的吧！说朗朗到日本参加比赛的事。”大家都不作声了。我注意到朗朗父亲的眼圈有点红，但他沉静依然，细长的眼角往上挑着。

“我原来是空政文工团拉二胡的，转业回了沈阳。人们对民族乐器不大瞧得起，我有气，就弄‘西洋乐器之王’（钢琴）给他们看看。我岁数过了，希望就寄托在儿子身上。朗朗3岁摸琴，4岁跟东北最有名望的钢琴老师、沈阳音乐学院的朱雅芬学琴。朱教授是上海人，对朗朗特别好，朗朗练琴练得很苦。冬天练得浑身是汗，就只穿背心。他8岁就夺得沈阳市钢琴比赛第一名，稍后又获辽宁省青少年钢琴比赛第一名。在辽宁我觉得他学到头了。九一年，他9岁时，我们父子俩移居北京。谁都知道，中央音乐学院及附小是皇冠上的一颗宝石。我国成千上万的‘音乐神童’都奔它来，考上就意味着成功……”

三个孩子中有一个是朗朗的表弟，学黑管的。这位表弟聪明调皮，很难管，他父母是做生意的，无暇顾及儿子的艺术生涯，就把他托给郎国任代管，同时也自告奋勇担负着警官父子的一部分生活费用。

大人说话时，三个孩子溜出黑黑的屋子，跑到阳光下。小院子里有些喇叭花和夹竹桃，孩子们与蜻蜓追逐嬉戏，早已忘记身处异乡和学琴的艰辛，发出了使人内心忽一下明朗起来的稚笑。郎国任的脸上浮出笑意：

“别人介绍音乐学院的一位老师辅导朗朗，他是上海人，瞧不起咱东北人，教得不多，倒动不动就考孩子。离入学考试还有半年时间，他突然提出不教了。说我们负担太重，怕考不上我们受不了，还说我们基础差，他教不了。这给我们打击挺大的，整个辽宁省第一名他还嫌基础差，不知怎么想的。剩这么短时间再换老师，有些来不及了。朗朗这孩子挺有志气的，瞧不上咱，咱还瞧不上他呢！沈阳的朱雅芬知道了，马上给介绍另外的老师。朱教授是那种处处为别人想得很细的人，都是上海人，为人处事太不同了。”

朗朗又和伙伴杀了进来，这次是端了盆西瓜。有人逗问他，你想家吗？他毫不思索：“想家，但一弹起琴就不想了，现在感觉哪都是家了。”

郎国任很有两下，一步步塑造了他的孩子：“老师不教了，朗朗有些灰心丧气，有一节课竟然跟同学出去玩了。我那时情绪不好，想刺激一下孩子，要不然就完了。我孤注一掷，把一瓶毒药扔桌上，板脸对他说：现在你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吃药自杀，二是爬到学校11层楼顶跳下去，三是回沈阳。朗朗惊呆了，他知道我向来说话算数，眼泪唰地掉下来，哭着求我：‘爸爸，我再也不这样了！’我内心难受得很，我们父子俩孤身在外，相依为命，这样折磨他真是于心不忍。但我仍然凶着脸。朗朗认为事情不可挽回了，就含着泪水，考虑起那三条路。回沈阳对他来说根本不可能，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打量起那瓶药。那是交沙雷素，杀白血球的，药性很厉害，他打开盖子，眼瞅着真要吃了，我赶紧故意上别的屋，他一下就醒悟过来了，把药一摔说：‘我不吃了，怎么的吧！’我心想，再弄下去他要气出神经病了，赶紧适可而止吧……”

郎国任是在朗朗不在屋的时候，把门关上对我说这些的。能看出他非常欣慰，他说朗朗是非常能把握自己的孩子，又不失孩子气，这点很难得。他知道全家的命运都担在他的小肩膀上，这么重的担子，他没有被压趴下，还拼着命干。钢琴是世界上音色最美的乐器，可是一天叫你坐那儿不动，10个

小时弹同样的曲目，你受得了吗？哪个孩子能心甘情愿地忍受？朗朗就行！结果，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

“我爱我师，我更爱我爸！”

“好冷啊，那房子！”朗朗说起白纸坊那简易楼，三九严寒他爸爸不生炉子，说咱东北人还怕这点寒。父子俩就在这简单而有些严酷的生活中度过。

“朗朗他妈妈在哪儿？”望着我们询问的眼神，朗国任又回到他不愿接触的现实：

“他母亲一个人在家，挺难的。她在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的电话总机工作。她要工作，为孩子存钱，咋说我们还要保住一个公职啊！我们住的那块不文明，一个单身女人，你想想，晚上有人砸玻璃……”

早起，他做了饭，爷俩吃了，就准备上路，他忘不了给朗朗装好白开水，他从不让他喝饮料，在日本拿金奖的当坎，朗朗还照喝他带去的白开水。然后他骑车带儿子去学校。儿子进了教室，他就窝到教室窗户下。中央音乐学院管理挺严，不让家长进去听课。他就趴在窗户外眼巴巴地看着里面。他拿着一支笔，记老师讲的，旁边放一个录音机，磁带在转。四年多，每天如此。下雨了，他穿雨衣，头发和眉毛都湿了；冬天他裹着军大衣。他笑着说，东北人嘛，就是不怕冻。他惊讶：什么，不去听？那恐怕不行！一是孩子理解力不如大人好，二是两脑子加一起总比一个好，回去我们俩研究，有什么问题我再去问问老师……学校有些人很有意见，说你瞧，朗朗他爹到咱学校安营扎寨了！时间长了，他们也就不说什么了。后来有些还跟他成了好朋友……中午朗朗下学他带他回去，做饭，下午再去学校。中外专家来校讲课交流，他早早就去占地方。几年来，他听专家讲课比许多老师都多。朗朗获奖后，活动多，他怕太分心，就给儿子去跑腿。他说每天晚上10点以后才是他的时间，这时他听艰深而好听的古典音乐。其实这也是献给儿子的时间，国内所能搜集到的世界著名乐队和钢琴家的CD，他差不多都听了。他听演奏风格和技巧，听旋律、节奏和细节上的处理……他说，孩子的天赋、刻苦很重要，但一个家长也非常重要，练功、弹曲子、抓机会，家长必须想在前头。

“移民点”的人们都很信任朗国任，药子藺的母亲说：“现在他自己就是一个专家，收着十几个学生。一到快考试，人们就纷纷找来，提着礼物，拿着钱，求他给孩子指点一下。

现在，朗朗爸爸地位很特殊，他什么工作也没有，闲杂人员一个，但中国音乐界，特别是钢琴界的名人差不多都认识他，有的对他相当友善，比如殷承宗从国外回来，不管多忙，必见他和朗朗，既是对朗朗的传授，也是与他的交流，已经连续4年如此。“院外专家”，这是人们送他的一个外号。当他的观点和音乐学院老师相左时，一些家长宁愿听他的。考试时，人们听到有些学生弹的曲子，就说：噢，那个肯定是朗朗他爸教的。

“在音乐上，是你对朗朗的影响大还是他的老师？”我问。

“哦，人们一般认为是他的老师，这个……咳……”

朗朗的老师赵屏国授课时，有时以一个教授身份评说朗国任，朗朗就会挺身而出，倔强地说：“我爸是对的！”在这点上，朗朗是“我爱我师，我更爱我爸”。

“钢琴比赛是一场树立民族自尊的战斗”

“我们是贫寒人家，势孤力单。”郎朗他爸这样评价自己。这时他表情黯淡，语言含糊：“中国人都是关系，看你是谁的学生，有没有后台，不是自己人就给设障碍，这种事你知道，音乐学院也难免。赵老师是个好人，但人老实……”

郎国任承认，这点上他感激外国人，是他们的承认，使郎朗脱拔于黏黏糊糊的人事关系。

1994年，“第四届德国埃特林根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在即，谁去？院内外都有人活动，一时莫衷一是。院方就先进行比赛，结果刚入学不久的郎朗超过高年级学生获得好成绩。

“这在世界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音乐比赛，相当于电影界的柏林电影节，我们爷俩高兴得不得了，可惜得自费去。郎朗、赵教授，加上我，每人16000元人民币，都得我去找。我想拼了。那时我们一穷二白，要想找四五万块钱是很难的，该变卖的变卖，该找亲友借找亲友借……德国干净漂亮，人也很友善，但也很严肃，在那要是找评委递条子、说情，简直不可想象。决赛完了，我一个人到一个角落等待宣布名次。主席从第五名开始念，念到第三名还没有郎朗，我想完了，我咋也不敢想郎朗会在前两名里，结果最后一个念到郎朗。我眼泪唰一下就流了出来。这是一个没人认识我的角落，我也不控制自己了。这么多年我不记得流过眼泪。郎朗的奋斗被承认了，这是国际上的承认。你再白眼、嘀咕、不满都没有用。”

郎朗父子对第二年的柴科夫斯基国际少年音乐赛的记忆更是刻骨铭心。郎朗在德国确立了名声后，第二年就被选送参加此赛。这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青少年音乐比赛，当年殷承宗、刘诗昆，就是在此赛青年组获银奖而确立中国钢琴界王牌地位的。

以往都在莫斯科举行，1995年俄罗斯方面因经济原因犯难，日本人欢欣鼓舞，投石问路，反复商洽，结果大赛移师日本仙台。

“初赛时，80名选手整整弹了6天，第二轮时被刷了一半，一起去的5名中国小孩全进了第二轮。接着可惨了，进入决赛就剩下6人，4个俄国人，一个日本人，还有我。”郎朗回忆着，并把日本人出的一本《郎朗画册》送给我，很老练地签上名字。

“郎朗太小，只有13岁，其他选手都是16、17岁，”郎国任说：“原来都认为郎朗这么大的孩子顶多弹弹技巧，理解不了什么情感、风格，谁知他恰恰在这上面占优势。外国评委说，这是一个懂柴科夫斯基的孩子。中国评委周广仁说，他的抒情性很打动人，决赛时忽然冒出一些光彩、火花来，把大家高兴坏了。”

郎朗说：“我的老师是留苏的，研究了一辈子‘老柴’。我中国曲子弹得稍差一些。”

“你没有多少人生阅历，你怎样去理解乐曲里隐含的东西？”记者问。

“我不知道真正的痛苦是什么样，但我可以想象，我知道人有时很悲伤，我也知道热情。”

“这个比赛是一个树立民族自尊心的战斗！”郎国任说：“日本人很看不起中国人，我们去了也不给配翻译，可对别的国家不同，日本NHK开始根本不给中国孩子镜头，集中报道俄罗斯人和上原才子。上原确实很棒，是雅

马哈出钱培养，在美国深造，又请了俄罗斯著名钢琴家指导，夺冠呼声很高，但几轮下来不一样了，电视台开始把镜头对准朗朗，观众也把目光集中在朗朗身上。决赛时，整个莫斯科爱乐乐团专门飞到日本给决赛孩子伴奏。乐团享誉世界，朗朗把他们弹得服服的。那指挥、那首席的微笑真让人舒服，日本观众听得泪流满面。这个时候我走到了大厅外面，我已经知道了结局，但我的感觉已经麻木了。”

朗朗递过我索要的材料，上面他的赵老师写道：“我禁不住流泪了，这么小的孩子，在大舞台上能发挥得这么好……唯独朗朗谢幕四次……一位俄罗斯选手的家长对我说：‘我听朗朗弹琴一直在流泪，从他的弹奏中我感到了阳光’……赛后我兴奋得三天没睡觉。这是我经历的比赛里，最激动人心的场面……大家都来祝贺，我真正挺起了胸脯。”

朗朗爸爸老是那个稳劲，慢条斯理地说：“也不是什么事都叫人高兴：按说这是代表国家参赛，结果这么重要的一个奖，新闻界无声无息，一问，他们根本不知道。六个星期后才有一家小报登出来……唉，什么事都是外国人抬出来，真让人心里不平静！国外对人才那个热！日本人别看傲，他要是真服了对你特别重视。《朝日新闻》、《读卖新闻》都上了头版大块文章，《肖邦》杂志出了两期，朗朗的照片登得大大的，名种特刊就多了……对比咱们，让人心里特别凉！”

郎国任试探地看着我说：咱国家重视体育不重视艺术，体育获奖回来那个热闹。其实，世界上的人对一个艺术大国和一个体育大国的尊重是不一样的。波兰这个国家有什么？就因为有了肖邦，国家为之生色。

“钢琴冠军”感叹：“我多想有一台钢琴！”

“那里没琴。”郎国任不愿我去他们白纸坊的简易楼。

“有台破琴，弦断了二十多根。”朗朗补充：“我弹坏三台琴了，最早是国产的，后来是日本和瑞典的。”

谈起琴，朗朗嘴没遮拦：“国产的没法弹，噢，当然，初学者可以弹弹。我只有坐在德国琴前才能产生感觉，连日本琴都不行。”

药子藺这里是一台日本“佳娃”，是他那在绥芬河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来回奔波做买卖的父亲从海关弄来的旧琴，上边还刻着一个日本姑娘的名字：浅草和子。

朗朗每天来这儿练这台“凑合弹的琴”，“我那台破琴，弦断了那么多，没有低音了，再说白纸坊没法待，邻居老放流行乐，我进入不了状态。”

朗朗那台瑞典琴要修得2000块钱，合计一下他们决定不修了。于是这个“世界第一名”一直在盼一台德国斯坦维。

斯坦维价值人民币8万至30万不等，最便宜的朗朗父子也买不起。中央音乐学院有那么几台斯坦维，宝贝一样，僧多粥少。“钢琴冠军”摸到它的机会不多，而且练琴环境较差，相互干扰。

“有些人能可劲用它，这里头有些说道……”郎国任说：“说句心里话，不是我是他父亲，对朗朗这样稀少的孩子，是不是应该有个小灶？这关系到国家的荣誉，关系到我们民族的人才！学校确实穷！原来我和朗朗想硬挺着，现在赶快办走算了。孩子不能没有他自己的一台琴！”

朗朗现在已是世界著名的钢琴手，在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意大

利、以色列等国举办过 30 多场个人专场演奏会。世界各著名音乐学府争先恐后邀请朗朗入学，郎国任替儿子挑选了据说是世界最好的美国朱利娅音乐学院。

“奖学金一年就有 3 万多美金，而且一入学每个学生发一台斯坦维。”

最后我问郎国任：“您还没说辞职的事。”

“这个事一想很难受，本来出了个朗朗，公安局领导很重视，市长知道了也支持，但下面有些人刁难。我核计了很久，辞职，背水一战。这样我个人就没了，十几岁参军……我把自己牺牲了。我们这样的家庭，两代人才能走出一个。”

10 天后，我给朗朗住处打电话，一个陌生的东北口音回答：他们去美国了。

我知道朗朗还会回来的，他们父子这样说过。

家庭经济条件拮据的大学生陈红桥带一个患病小女孩看病的故事，讲述得那样平实，又那样动情，读来让人眼眶一阵阵发热。对尚无经济来源的、学习任务很重的大学生，是否应该承担此任，暂且不论，但我们从文中看到的，使我们心酸眼热的是陈红桥——这位当代大学生善良、富于同情心的心路历程。

惟有真情对青天

冯广博 陈渊

采访陈红桥，是 1996 年暑假。我们向他问了很多问题，想详细了解关于他为李茗治病的故事。他从里屋拿出两本日记，说：“我所做的，都在这上面了。”

我怎么也不相信，眼前这个可爱的小女孩竟患有可怕的癫痫病！
我酝酿着一个伟大的计划

1995 年寒假，我从武汉汽车工业大学回到了湖北十堰的家里。第二天，我顶替母亲干起了卖甘蔗的行当。

傍晚，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

突然，一个小黑点，跃入了我的眼帘。她胆怯、羞涩，却灵活之极。她像只灰兔子，突地跳进垃圾堆，寻觅可卖的东西，偶尔抬起头拭去脸上的汗。我这才看清，原来这是一个长得很稚气、很清秀的小姑娘，她穿着一身旧棉衣，脏得无法分清它的颜色，漆黑一片，恰似一团黑炭，而那对天真明亮的眸子却在暮色中闪烁着。

她似乎发觉我在看她，慌忙低下头去，背起一个黑袋子，转眼便消失了。相同的情景多次在我眼前出现。

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小就出来捡破烂？我心中一片谜团。

在我卖甘蔗的对面，有个修鞋的中年妇女。一天中午，我忽然发现一个小黑点（这正是那个捡垃圾的小女孩！）走近了她。小女孩从布袋里端出一个饭盒子，说：“妈，吃饭。”然后拿起盒盖为她妈跑去打水。

这工夫，买甘蔗的很少，我便凑上前去。你猜她吃的是什么？一碗稀粥，上面漂着几片煮得发黄的小白菜。我愕然。补鞋女人对我笑笑。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我开始了解小女孩的一些情况。她叫李茗（原名李明），父母几年前从 300 多里外的郧县大山区迁居十堰，租住两间小屋，靠补鞋、修理自行车养家糊口。李茗有一个上初中的哥哥和一个上小学 3 年级的姐姐。

令我震惊的是，李茗今年 12 岁了，还没上过学！可她是个很聪明的小姑娘呀！

再后来，我得知，9 岁那年，李茗不小心将邻家的小女孩弄哭了，小孩的妈气得向小茗大吼，李茗当场吓得昏了过去。祸不单行，晚上李茗一家正睡得香，周围正在施工的建筑物上突然掉下一块大石头砸在了李茗家的棚顶上，“砰”的一声巨响震醒了李茗，她又一次昏了过去，全身痉挛，口吐白沫。从此患下了一种病——癫痫病。而她家里实在太穷，无钱医治，父母找来土方也无济于事。3 年来李茗的病情越来越重，有时一天发病几次。她的

左手由于长期痉挛，已变得略有萎缩，且没有一点力气。

多可怜的小姑娘！不能上学，还病魔缠身，终身痛苦。许多天，我呆望着天空，心情沉重得没有一点情绪。我在想，这种病，可否治好？

大年初一，我走下楼来赏雪。远远地看到小茗妈还在老地方守着补鞋摊。

“红桥哥哥，到我家去玩吧。”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小茗又来给她妈送饭了。

顺着一条弯曲的羊肠小路，我跟着小茗到了她家。这是怎样一个住处呵：两间小黑房低矮、昏暗、潮湿，一股霉气冲鼻而来。床上是破旧的棉絮，除了外屋的一个土灶和几把残损的椅子外，家中一无所有。

李茗的姐姐在洗衣眼，她的爸爸带着她哥哥李波回老家郟县去了。

李茗给我倒了杯加糖的开水，甜甜地叫：“哥哥，喝水。”我想：糖水是她家招待客人最好的东西了吧。眼前这个聪明、懂事的小姑娘让我怎么也不能和可怕的癫痫病联系起来。

我心里又一次沉重起来。

“小茗，你想上学吗？”我问。“想，可是，老师说我有病不能上学呀。”小茗眼前分明闪烁着泪花！我鼻子有些酸。

我开始酝酿一个伟大的计划。

我开始了解这种病史，找医生，查资料，访同学，发觉她的病有治愈的希望，但只是希望而已。因为，癫痫病俗称羊角风，医学上称为“神经癌症”，能治好的很少很少。但是，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就不能放弃！

我瞒着家人，说服了李茗一家，踏上了去武汉求医的路途……

肩上的担子好重好重，我稚嫩的肩膀能否承受得起？我决定利用上学的机会，带小茗去武汉治病。十堰目前没有癫痫病专科。但这事必须对家里保密。

父亲是二汽五一厂老工人，母亲没有工作，姐姐眼看就要成家，小妹妹今年上高三，我上武汽大，属于委培生，每年学费、生活费上万元。父亲的工资显然是杯水车薪，母亲靠卖甘蔗、做点小买卖，赚点钱补贴家用……家里这种状况怎么可能同意让我做这件事？再说，父亲的脾气……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小茗父母。小茗父母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叹息家穷，无能为力。

想象着即将做的我20年来从未做过的顶天立地的大事，我心中又喜悦又担忧。前面的路该怎样走，小茗的病情如何，得花多少钱，我也说不清。我心中承诺：无论困难多大，花多少钱，我一定要治好她的病，让她读书。

一夜安然，2月27日晨，我和小茗安全到校。

知道小茗的事的同学纷纷送来了点心、水果，女同学送来毛衣、线裤和围巾。小茗呢？对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一切，怯怯的，有些新奇和害怕。

医生让我第二天带她去做脑电图。

27日傍晚，我带小茗来到小吃店。

小茗看着一碗热乎乎的面条，又看着我，却不动筷子。她说太多了，在家里，她只吃一小碗稀饭就可以了。

我一愣，笑着对她说：“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吃不完，小龙（我的小名）哥哥帮你吃。”

小茗乐了。她最听我的话。

第二天上午，我和同学胡柯华请假去武汉总医院为小茗做脑电图。当医生得知情况后，很受感动，安装仪表时更为仔细和认真。医生在小茗头上安了无数的小插头，然后分别通上低微电流，又固定了小茗的手和脚。

我担心小茗在拍片子时害怕，凑上前去轻声说：“有小龙哥哥在旁边，不要害怕。”她懂事地点点头。

29日，检查结果下来了，小茗大脑的前方波率较为杂乱，但不明原因。医生建议我们做CT扫描，看大脑结构是否正常，医生有顾虑：我们是学生，哪有这么多钱？

CT扫描后，大脑结构正常，但病情较严重。医生开了两种药，说：治疗的关键在这半年。至于根治，目前尚无良方。

我带来的生活费1000元所剩无几。

一位女老师很喜欢小茗，让小茗住在她家。安顿好小茗，我忽然想起，我给堂兄带的香肠还没送去呢。

不料一到堂兄家，嫂子就嚷起来：“你把我们都急死了，你家里打了4次电话，那个小姑娘现在在哪里？”我脑袋“嗡”地一响，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我连忙给家里打电话，电话是姐姐接的，她用不容商量的口气给我出了一道选择题：要么她来接小茗回家，要么我送小茗回去，否则，家里以后不认我这个儿子，她也不认我这个弟弟了。

我知道姐姐的脾气：刀子嘴豆腐心。我告诉姐姐，来校后，许多同学和老师都关心这事。给小茗治病不容易，且治愈希望很大，这半年的时间不能错过，治好后，我立刻送她回十堰。

姐姐终于被我说服。我并没感到轻松，我预感还有事情发生。果然，在堂兄家的饭桌上，一向开通的堂哥堂嫂也投了反对票。哥哥说：“并非我们没有同情心，只是现在条件不许可，你家里条件也不好，你本身也是个消费者。”他们坚决要求我送小茗回去。

3月3日下午，指导员把我带到新生部领导面前。这儿十几名老师神情严肃。我预感天有不测风云。

老师开始对我的做法表示肯定。但他们说：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他们主张送小茗回去治病。并问我：贫穷不计其数，你帮得过来吗？要帮，也是希望工程的事情。

谈到社会现象，我表示不同意：社会需要帮助的人的确很多，但怎么去帮。我在想，如果能帮一个就帮一个，这有何错呢？

况且，小茗不仅没上学，而且还有病呀！若拖延下去，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将会……后果不堪设想。到那时，花再多的钱又有有什么用呢？作为热血青年，当代大学生，自愿来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又何尝不可呢？

所有的老师都笑了，他们赞成我的观点，但送小茗回去，是应该且必须的，学校确实没这个条件。我点了头，心中却暗下决心：不管怎样，决不能半途而废！

3月4日，元宵节，我带着小茗散步。华灯齐放，一派节日气氛的江城之夜给多少人带来了欢乐、幸福，而小茗，她的病却没有结果。我心中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小茗，明天我就要送你回去了，哥哥觉得好失望，好伤心。”“你失

望，我还痛苦着呢。”小茗的话把我逗笑了，“武汉的哥哥姐姐对我多好，我真的舍不得。我以后也到这儿上学，好不好，小龙哥哥？”望着小茗那双天真明亮的眼睛，我长久没有说话，心中满是酸楚。

“根治”二字让我一降兴苗。南京之行，几番波折

小茗回家的这段日子，我心里空落落的。

十堰的同学写信告诉我，小茗吃了从武汉带回的药有一定效果。但我仍不放心，医生开药时曾说过，他的药只能控制病情，但要治愈，还没有先例。

在给小茗治病的同时，我写信四处求医。寻找最好的医生。

同济医大的同学回信了，信中寄来一位医学教授的推荐信，说：江苏南京浦口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癫痫病专科有一位名叫郑维峰的医生对癫痫病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目前已根治数人。“根治”！我心中一阵兴奋。我连忙发了三封快件与南京联系。不久，南京方面有了回音，要我迅速带小茗去治疗。

我要面临的很现实的问题是：筹钱。我现在手里仅剩的是借来的300元生活费。在开始这个计划的时候，我就决定不能让家里增加负担，我必须依靠自己的双手。

我决定利用休息时间去打工。一家公司同意我帮他们推销产品，同时，我每周六去搞家教。

真的好累。我曾在心中存着这样一个想法：放弃班长和新生部人文系学生会主席职务，好一心一意为小茗治病。我的好朋友很严厉地批评了我。

老师和同学听说这事之后，纷纷解囊相助，短短几天，我收到各地汇款2500余元。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让小茗父亲带着小茗来武汉。小茗见到我，叫了声“小龙哥哥”，眼里满是泪水。

4月30日，我和同学许恒东带着小茗和她的父亲登上去南京的客轮。

5月2日刚下船，我便听到一声欢呼。南京邮电大学的同学沈劫来接我们了。

沈劫能力很强，他将我们都做了妥善安排。

时间紧迫，到“南邮”的当天，我便决定带小茗去治病。

我给医生打了个电话，而这个电话却让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郑医生很抱歉地告诉我，目前他正在学习，20天后，他一定给门诊。

20天！我们的时间不允许啊！

到别的地方去看，我们又不放心。我连夜给郑医生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信。郑医生破例门诊是在两天之后。

半个多小时的诊断，郑医生得出的结论是：小茗的病较为严重，发病周期短且频繁，实属罕见。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她9至12岁从未认真治过。他让我下午去取药，并说，小茗可以不必再来了，4~7个疗程便可治愈。

5月7日，我们从南京到武汉下船的时候，遇见一位阿姨。她听说这事后，将手中的80元塞到我手中，我刚想谢绝，司机已将车飞也似地开向茫茫人海中……

那位略知一二的司机，硬是不收我们的钱，并塞给小茗20元，说：“我要向你们学习。”我们能说些什么呢？车已消失在路的尽头。

又一次送小茗回家，她的眼泪扑扑直流。我拍拍她的小肩膀，安慰她说：“听话，回去好好服药。

她点了点头。

一句句热忱的话语，一张张真诚的面孔

这件事牵动了这么多人的心。是我没有料到的。

纪雯，湖北黄石人，一个工厂的工人。她每月定期寄来 50 元钱资助小茗，而她的月薪仅 300 多元！我们并不相识。

许恒东，湖南衡阳人，家住农村，有一颗火热男儿的心。“南京之行”开支巨大，钱不够，怎么办？他一咬牙，除了开学初捐了 20 元外，又将 550 元生活费全部拿出，而自己的餐票仅剩可怜的 0.36 元。

陆成斌，中南民族学院学生，为资助小茗，省吃俭用，三次共拿出 300 元。

付强，我高中同学，考入同济医科大学，为筹钱，他也找了家教，5 月初将 110 元专程送来，还四处寻医。

沈劫，就读于南京邮电学院。在我们返回武汉之后，他和同学关正海、李健、侯东霞等人凑齐 100 元汇来。

卢元强、黄尚荣、万红金、曾晓红、祝玲玲、刘树……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伸出了温暖的双手。

我们 7 个长期资助小茗的同学组成了“长助组”。6 月底，“长助组”的部分成员聚集在我们校园的操场上，击掌立誓：无论将来遇到多大的困难，小茗治病和读书的事一定要坚持到底。四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从 2 月 26 日到 7 月 14 日，我收到了近 200 封来信和 4600 多元汇款。

这件事还牵动着北京、南京、上海、西安、十堰……十几个城市，20 几所高校，上千名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心！

北京的同学说：“作为当代大学生，不仅要有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有社会责任心……”

上海的同学说：“我的一位同学，听说此事后，每月捐助 10 元。现在队伍扩大了……”

同济的同学说：“帮助小茗，加我一份……”

华工的同学说：“份内的事，我们共同来做……”

十堰的同学说：“若有难处，我们将尽全力……”

南京的同学说：“让我们共同托起那轮太阳吧，让她充满朝气，散发光芒……”

一张张真诚的面孔，一句句热忱的话语。我常常被感动得难以入眠……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似乎是一种神话，但是它确实已经发生了。

我的力量真是太小太小，若是没有他们这么多人热心相助，我真不敢想象，我能否将这件事顺利地坚持做下去？我曾经彷徨过、苦恼过，是他们，一次次鼓起我的勇气，坚定了我的信心。

我将李明的“明”改为“茗”。“茗”，香茶也。

小茗，你可知道哥哥的心情？

路还长，故事没有结束

今年8月中旬，笔者又在二汽（现东风汽车公司）五一厂离陈红桥家不远的冷饮摊上见到他。他带着我们穿过五一厂后面的一个山沟，来到李茗的家。

李茗的家比我想象的更为简陋、寒碜，两间小屋黑乎乎的，散发着一股潮湿的霉气。

李茗从里屋奔出来，甜甜地冲着红桥叫了声“哥哥”。

红桥问：“作业做了吗？”

李茗现在每天上午在红桥家由红桥和他妹妹帮助补习小学一年级功课。小茗进步很快。

红桥欣慰地告诉我们：“郑医生的药效果很好，以前小茗的病严重的时候一天犯几次，第一疗程后，基本上得到控制，半月犯一次。原来有点萎缩的左手也恢复正常了。看来治好的希望很大。十堰的王艳梅、霍银芝等同学在我开学后定期向我反馈小茗的情况，她们十分热心。”

问起小茗以后的事，红桥说：“治好这病需4至7个疗程，每个疗程花费上千元，还是医生优惠一折的价。第二个疗程的药还没寄来。病治好，按我们的计划还要供她上学……”他忽然打住。

“钱的缺口很大吧。”我们替他接上话。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小茗从外地迁来，没有十堰户口，哪所学校愿意收呢？”他说。

8月20日，我们接到陈红桥的电话，他欣喜地告诉我们：二汽五一厂小学校长已表示，李茗病好后，可以来他们学校上学，并免去全部费用。

帕米尔高原7月份都会下雪，一天能过四季。木吉边防连是帕米尔边防团最边远的边防连队——下了公路还要在山顶、山谷、河道、荒滩上颠荡79公里。这79公里是一段“三跳”跳：车在地上跳，人在车里跳，五脏六腑在肚里跳。一车菜颠荡这一路得损耗2/3，西红柿都成了西红柿酱。在这片荒蛮壮丽的防区，乱石戈壁、陡坡冰河、深沟石坑、旱獭洞时时围绕看他们。他们说：穿这身衣服（指军服），辛苦不算啥，受罪也不怕，就为向祖国报告一声：防区平安！“三跳”之路是一条报国之路，在这条路上行进着的热血男儿，是何等的英武，何等的豪迈！

“三跳”之路 报国之路 李文芳 杨海生 辛银祥 叶研 季元宏

夜里11点多了，即使在地处祖国“西极”的木吉军营里，这也是该停电熄灯的时刻了。连熬两夜的指导员赖万峰现在没有一丝睡意，打着手电在营区左转右转，靠忙碌来充实这还要持续两三个小时的等待。

他在等凌晨3点多时出发巡逻的6名部下回营。

他倒不是特别担心这支精兵组成的巡逻队会有不测——虽然这种连续24小时巡查160公里险山恶水的例行任务经常会出现伤病。这不光是因为这一昼夜毕竟天气晴好，而且是充分相信这6名官兵的体能、经验和人品。但他不能躺着等，而是要随时准备迎到大门口，要亲自把一盆热辣辣的面片端给24小时艰苦跋涉中只吃过一次温饭的那6位弟兄。

实际上，全连此刻没有一个人上床，甚至有人装束齐整地在连部和院内穿进穿出。这是一个不成文的传统：每逢有战友出发巡边，大家一定都要眼看着他们回营才会躺下。

“指导员，快！”

赖万峰回到连部，对屋里那位校官憨憨一笑，就与手下一位少尉一唱一和地叫起阵来，说是要接着打晚饭前的那场“双抠”，让新疆军区和南疆军区下来的这两位首长再钻几趟桌子。

刚拉开抽屉摸扑克，院里一阵骚动。连部的门“哐当”一声撞到墙上，背挎钢枪的吴东峰在众人簇拥中大喊：“指导员，快！排长不行了。”

参加巡逻的吴东峰能比预定时间提前两小时回到连队，令众人大为惊诧。但他那满头的热汗、泥水淋漓的裤和痛切的大喊，已让训练有素又兄弟情深的官兵们不再追问细节，眨眼间便纷纷奔向院内，找车、喊司机、牵马、备药……

赖万峰只问了三句：“杜建国咋了？”

“吐了。肚子疼得很。骑不得马了。”

“吃啥了？”

“没啥，就是饭和苹果。”

“离这儿多远？”

“七八公里。”

说话间到了车库门口，有战士说司机刚从团里回来就出去给附近柯尔克孜老乡送邮包去了。

赖万峰拿手电照准车库门上的钢锁：“不等了！砸开它！”

院子里干净得很，好容易才摸着块鹅卵石，“咔咔”凿得门锁直冒火星，可就是砸不开。

眼见旁边停着军区首长带来的一辆“213”，越野吉普（俗称“切诺基”），有人喊了句：“用这个。”一向雷厉风行的赖万峰此时却迟疑了：“这行吗？路可险得很。”

军区来的司机小何倒没二话，匆匆抹干洗到半截的双脚，单衣扣还没扣齐就发动了车。赖万峰也顾不上找大衣，拉开门上了车。两分钟时间，“213”已轰响着冲进黑幕笼罩的茫茫戈壁滩。

“杜建国吐了”

从顶着一弯新月和满天星斗自连里出发，带队的见习排长杜建国一直在提醒战士不要为驱寒而长距离策马狂奔，以防止战友出现感冒和体力不支，也是为保证6匹军马不致过早疲惫。

杜建国对自己的身体很自信。3年的士兵生活中，他已摔打磨练得能够充分适应帕米尔高原上的高寒、干燥、缺氧的恶劣环境。在考入乌鲁木齐步兵学院后，严厉得近乎残酷的体能训练使得他的身体素质更上一层楼。每天五更即起，立即是5公里负重越野跑，上下午满满的文化课后，还要作完200个俯卧撑和200个仰卧起坐才能上床，天天如此，绝无例外。两年下来，他浑身轻健得没有一两多余的肉。他又分回了连队，也把这种严格的训练作风带了回来，并带动战士每天上床前至少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各100个。

从连部到奥伊巴勒根山隘观察点的这条80公里巡逻线路，他已经熟悉到自己也数不清走过多少遍了。路上有多少道梁、多少个岔口，冬天夏天应怎样变换行军方式，时间和体力在几个路段上如何分配，他随口能作出精确的判断和分析。这次带4名4年军龄的中士和1名下士巡逻，他心里十分踏实，只是不时前跑后颠地看看队形，提醒他们不要过早、过度地兴奋和疲劳……然而，他自己却倒下了……

在此之前，一切都很顺利。出发后8小时的连续疾行中，每段路程都恰好按时完成。凛冽彻骨的酷寒没使一人伤风、冻脚，怪石嶙峋的山道和深浅难测的冰河没有伤及一匹军马。烤火、烧水、吃饭、休息一小时后，6个人拴定马匹，徒步跨过起伏的山丘和巨岩叠立的阶地。6个小时后，在接近体力极限之际，终于到达海拔4624.9米的观察哨点位，按任务要求完成了边界标志附近的观测和记录。此时，灿烂了一天的太阳已经昏然西坠，异国的冰峰投来数十公里长的阴影，阵阵凉风无声地鼓荡而来。杜建国召拢举枪欢呼后仍余兴未尽却又疲累得躺在乱石中喘息的弟兄们，迅速整队回返。他们沿路拾起预留的氧气袋，穿好爬坡前甩掉的大衣，跨上饱食、休养后的战马。回首西望暮霭中的国界山岭，6人齐刷刷敬了个举手礼，随即一夹马肚，6匹马登时昂首奋蹄，头尾一线相连地向东绝尘而去。

此时已是晚7点半，但杜建国感觉很轻松，不时放声吆喝几嗓子战友，既是为鼓舞士气，也是联络接应。几番疾驰之后，天已黑透，6匹马慢了下来。6人不时啃几口怀中捂着的干粮和衣兜中冰凉的青苹果，在星月无光的峡谷间鱼贯而行。

杜建国正微笑地欣赏着黑地里传来的嘶哑歌声，突然胃里一阵痉挛，喉

间涌动着—股酸热。他强挺着，俯身抱住了马脖子。片刻间，—阵晕眩袭来，终于忍不住喷吐出来，惊得军马登时盘转腾挪。旁边的刘学路听出了异样，—把勒住排长那匹马的缰绳。

“咋啦，排长？”

“苹果吃坏了。”

“还行吗？”

“没事。歇歇就好。”

但病情比杜建国自己的想象要严重得多，下马连呕数口之后，他拳头顶着肚子蹲了半天，再强努着上马已是姿势不正、无力控缰了。

眼见排长在打火机的微光中冷汗浸透、眉宇紧缩，三个战士—边围拢替他遮风，—边迅速商量出救急方案：“叫吴东峰回去。”

“这么好的战士，我怎能不想留？”

吴东峰是连里公认的骑术高手。这个四兄弟中最小的农家子弟，调皮又大胆，到连队才半年就摔打出过人的驯马、骑马技术。那匹最烈的白鼻梁枣红马，从内蒙古买回连里后接连摔伤几名官兵，最后终于在驮着吴东峰狂奔了几十公里荒漠险滩后服贴下来。于是这匹高出同类—头的“疯马”几乎成了吴东峰的专用坐骑。这次巡逻中，这对人马从出发到返回照例是跑在头里，时不时还要撒起欢来狂跑—阵。

听到战友追上来说排长病了，吴东峰先以为是开玩笑。待回来看出杜建国已几近脱水，他当仁不让地说了声“我先回去报信”，便圈转马头，—抖缰绳，—人一马登时不见了身影……

吴东峰对部队、战友和荒蛮而壮丽的帕米尔高原有很深的感情。

初中毕业时，甘肃省武山县老家那单调的乡间中学和人均七八分薄地的农耕生活，已拘不住他的佻好胜之心。像带回种种传奇和自豪的乡邻—样，他也走上了从军之路。

坐火车到西安，乘飞机下南疆，喀什街头兄弟民族的奇异风情令他如梦似幻。翻过千层岭，爬过万道坡，登上了帕米尔的高山顶，巍峨高耸的慕士塔格冰峰和碧绿接天的塔什库尔干大草原让他如醉如痴。

大开眼界和胸襟的吴东峰，在严密的入伍教育和严格的新兵训练中又丰满、充实了荣誉感和责任感。下到边防基层连队后，严肃的国土意识和军旅纪律终于代替了昔日的好奇之心和娇憨散漫，天真少年已成熟为沉稳的军人。到木吉的第二年，他因训练、执勤、生活处处吃苦争先而被任命为班长。“新三年部队基本建设”中，连里翻盖营房，他在4月份的严寒中第—个脱去鞋袜，赤足踏水和泥，令全连内外至今叹服不已。

服役4年中，吴东峰荣立过三等功，获得过“昆仑卫士”称号，其过硬的军事技术也已名声在外了。半年前，新到职的团长程佐胜巡视各连到木吉，吴东峰陪他骑马作了—次两昼夜边境巡逻，立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前几天，超期服役将满—年而面临退伍的吴东峰，专门写了封信给程佐胜，恳请团长特批他在“这个舍不得离开的连队”再多服役—年。程佐胜几天后驱车200多公里来到木吉，当面“骂”了他—场：“你怎么这么傻？这个苦哈哈的地方有什么可留恋的？在这里站了4年哨，你已经大大超过你应尽的义务了。凭你的本事，到哪里不能出人头地过上好生活？你该回家享福了。让别

人也来吃吃这里的苦吧。我不能让你再干了！”回到团部，这位南疆军区最年轻的团首长情不自禁地在党委会上谈到吴东峰，深为感慨：“这么好的战士，我怎么不想留他？可他不符合高中毕业的提干硬指标，团里有限的志愿兵名额又要优先留给有多种技术专长的战士。既然留不住他，我只能用些‘鬼话’来搪塞了。”

既然肯定要走了，依依不舍的吴东峰又缠住了指导员，坚决要参加这最后一次艰苦而光荣的巡逻。赖万峰感动之余，从十几名争抢这次任务的老兵中挑出了他和常怀军、苟代全3人参加这次“告别巡逻”。

这一天一夜中，吴东峰几度凝望熟悉的雪岭冰河叹惜出声，时时不忘指点即将接替他岗位的上等兵王小平，从路径到天气，从带兵到驭马，直到站在奥伊巴勒根山隘上那块标志国界的铁牌前作全盘的任务交接，并庄重地互致军礼。

现在，排长的不幸打破了他最后的平静，又最后凸现了他过人的才华和热情。他浑不顾陡坡、深沟、冰河、石坑、旱獭洞的凶险，在漆黑一片中凭记忆感觉着路径，一再狠踢心爱的坐骑，呼啸生风地飞驰。蓦然间，前下方依稀辨出了一丝灯明，马头前赫然出现连部前那片冰莹闪烁的荒滩。他没有像平时那样“之”字形盘下60多度的陡崖，而是勒定马头直冲过去，纵马跃向七八米之下的乱石戈壁。

“哗啦啦”一阵乱响，枣红马跌翻了，吴东峰滚身爬起，顾不上看马匹是否受伤，蹚踩着冰碴冷水草窝鹅卵石，盯准灯光，跌跌撞撞地冲进营门，一溜水印地撞入连部。

“别熄灯！”

“213”吉普载着指导员刚出门不久，营房里的灯一齐暗了两秒又重新放亮。这是12点整停止发电前的预告讯号。连部里登时传出一声喊：“别熄灯！人还没回来。”

连部那个刚入伍的通讯员，平时腼腆得给首长搬椅子时竟能脸红，跟外人说话声低难辨，听到笑话只会躲到屋外偷乐，这时突然大吼得变了声地奔向机房：“别关灯！别关电机——”

在一年里有8个月上冻的木吉，11月时虽然日出耀眼，却早已天寒草枯。逐草而牧的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维吾尔族牧民早就赶着羊群下山了。4000多米海拔的巡逻区域中，百里无人烟。黑夜中的军人全靠营房的灯明认清方向，并鼓足最后一口气闯出荒凉寂静的群山。

今夜，灯绝对不能灭。

全连官兵都在紧张而平静地奔忙着。

小战士从吴东峰手中接过马缰，拉着大汗淋漓的枣红马满院子溜达，老战士特地嘱咐他：“两个小时内绝对不能给它喝水喂料。一直溜，直到汗落干净。不然马会生大病。”

吴东峰顾不得换战友拿来的干净衣裤，直着脖子喝下三大缸子热茶后，站在院子里向连卫生员讲完了排长的病状。

“可能是肠胃炎，能治。也可能是阑尾炎，要动手术，在山上很危险，送团部不如直接下山送喀什。”

10分钟不到，司务长开好了证明，揣好了将用作住院押金的一笔现金，

穿戴整齐地准备随时上路……

跟吴东峰一起回来报信却因多带排长那匹马而落后的刘学路，一路喊着进了院门：“咳呀，差点拐到另一条山沟里，多亏了连里的灯。”

靠着营房灯火的指引和鼓舞，苟代全和王小平也回来了。听到吉普早已上路，两人长舒一口气：“常怀军架着排长休息呢，走不动了，怕吴东峰跑得太快出事，又让我们先赶回来报信。好了，这会儿车该到了。”

“213”回来了。面对傻了眼的人众，独自回来的司机小何低头解释：“指导员带着拐错了路，要不是刹车快，就栽到那条深沟里了。掉头再找路，我发现汽油快用完了……指导员下车步行去找他们了……”

小何话音未断，连里那辆8座吉普已经亮灯掉头开向营门，苟代全和王小平等五六个战友撑着3个敞开的车门往上蹿……

“穿这身衣服，辛苦不算啥”

赖万峰下了“213”后，拧亮手电，顺着山路连走带跑，一路不停地呼唤：“杜建国……常怀军……”

连长下山探家去了。连里连外大大小小的事都落在他这个指导员一人肩上了。他不在乎累和操心，只要任务和全连弟兄不出问题。

这次巡逻用马不用车，他自信没有错。这个季节里，比起磕绊颠荡中容易趴窝的旧吉普车，熟路识途的军马毕竟更可靠些。但夜里出来救人，就只能冒险用速度快又有灯照明的汽车了。

这个长年驻守在帕米尔高原的边防团，社会依托条件很差。团常驻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只有人口2.7万人，地广人稀。而木吉边防连是这个团最边远的连队，下了公路还要在山顶、山谷、河道、荒滩上颠荡79公里，那滋味外人根本无法体会。这是一段“三跳”路，车在地上跳，人在车里跳，五脏六腑在肚里跳。一车菜从公路颠到木吉连队得损耗2/3，西红柿都成了西红柿酱。在这条路上，东风油槽车的传动轴都扭断过。因此，在这段路上出车，一般都带着电话单机，随时准备请求接应。也数不清是多少次夜间接应巡逻队了。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巡逻队预定时间两小时后回不到驻地，就得立刻派出接应车辆。有时连队车况不好，就得雇老乡的车。

赖万峰在军校学的是连防勤务，不是政工，1992年到连队后却一直热衷于带队巡逻。巡逻命令下来，从来不管那一天天气如何。其实，就是让你预定个好天巡逻，你也不一定找得准。帕米尔高原7月都会下雪，一天能过四季。

夏天时，赖万峰有一次带队乘车巡逻F号点。出门时大好的太阳天，不到中午却下开了雹子，雹子过后雨雪交加，打得人没法睁眼。这时候陷了车。赖万峰跳进冰水里用战备锹挖车道。高原草根又深又硬，锹挖不动，只好用军刺一块块撬。巡逻队员挽起裤腿下泥水里挖，从军大衣湿到内裤。折腾了6个小时，巡逻车出了泥塘。所有巡逻队员冻得嘴唇乌青，直嘬牙花子，但个个要求往前走，因为巡逻要“到点到位”。赖万峰内心一阵感动。在边防军人这里，“国土意识”几个字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赖万峰平日常说：穿这身衣服，辛苦不算啥，受罪也不怕，就为向祖国报告一声：防区平安！

今日这片肃杀寂寞的帕米尔高原，两千年前即以南、北两条“丝绸之路”

皆穿之而过的“葱岭”之名而享誉中外。张骞、玄奘等人曾从这里出入西域、印度，汉唐盛世的中华文化和物资财宝都靠阿拉伯、波斯、欧洲的商人经这里输向远方。鸦片战争之后，列强群狼环伺神州，不列颠的炮灰阿古柏乘乱从这里杀进大清的西门，进而蹂躏全疆数年之久，直到左宗棠西征时才被大将刘锦棠从这里把他赶回瓦罕。这里的安危得失一直与中华古国的盛衰荣辱息息相关。

对这些史实，赖万峰毕竟只有笼统而朦胧的知识。但凭着对这片神奇土地今日的珍贵和身为防止分裂、抵御入侵直接责任者中的一员，他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感受。

“戈壁滩上的路是活的”

排长上吐下泻，显出神志迷糊的脱水症状。

班长常怀军架着排长一步一步挪着走，不敢让排长睡着。为了把马匹带回连队和减轻接应负担，战友们带着他们两人的马先走了。山里冷风强劲，哈气成冰，远处的狼嚎一声连一声，听声音是一群。山里狼多成灾，当地政府对打狼实行鼓励政策，打一只奖励 200 元。

常怀军除了替排长身体担心，心里并不慌张。唯一不踏实的，就是怕同接应人员走岔了。山里没路，反过来说，能过车过马的又都是路。这一点常怀军比别人更清楚。因为快退伍了，1995 年 9 月交了车，这以前他是连里的驾驶员，拉油料、运物资、送病号、接人开会都是他的车。后勤保障是常怀军开车，巡逻也是常怀军开车。刚把菜拉到连里，卸了菜拉上人去巡逻也是常有的事。巡逻队员可以轮换，车辆和司机很少轮换。

1995 年 7 月，常怀军驾车运巡逻队去中国最西部的乌孜别里山口。乌孜别里风雪无常，走时大晴天，回时暴风雪。能见度先是十来米，一会儿就看不清引擎盖了，到最后干脆连倒车镜都看不到了。挡风玻璃结了冰，刮水器也不顶用。指导员赖万峰打算下车引路竟被狂风打倒，只因抓住车门才没被吹走、他不敢停车，怕水箱结冰，硬着头皮开，纯粹凭感觉。幸亏平时开车注意看地形记地形，开到什么地方能猜个大概。但风雪弥漫中最终还是开错了方向，车子开不动了，原来偏离了两山之间的谷地，开上了山。后来风雪减弱，他们才脱离了险境。

常怀军把防区的地貌概括为：9 个戈壁滩，99 道湾，夏天洪水，冬天冰滩。由于地表水的冲刷，道路经常变样，有的能上不能下，有的晴天能走雨天不能走。今天晚上，接替常怀军的司机能在夜间把车开进山，并找到他们吗？

第一次出现的车灯消失了。半个多小时没有再出现。

常怀军不敢怠慢，架着排长赶紧往黑山口走，因为那里是所有小路都要交汇在一起的关口。如果在下回灯光出现之前赶到黑山口，那不用费劲，双方自然会走到一起。

“我自信了”

在这最后一次效力边防的巡逻中，与吴东峰是同县老乡的常怀军也在回味这 4 年单调、清苦却又备感充实的边关生涯。

他还没过多地盘算回家后如何重新开始百姓生活。回武山，还是出去闯都市？再说吧……

在黎明前的山路上，谈及4年的感受和收获，比吴东峰更显沉稳的常怀军思索良久后进出一句：“我自信了。”

“这几年在部队锻炼、受教育，应该说是很难得的经历。以前在家时知道的事和道理都少，想事待人都心里没谱。来这里后不知不觉就变了。而且，老在这些高山大河中转，心胸也开阔了，以前憋在心里的不少事和想法，渐渐都看得淡了，也看开了。真的，将来我回去，就是种地我也不再觉得委屈了，去北京、深圳我也什么事都敢接过来干了，顶多从头学嘛。这里这么苦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更难的呢？有了这段光荣自豪的经历，今后生活再平淡，心里又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呢？”他说。

在这里当兵，尤其是在基层连队，一切崇高的意识和真诚的友情，都需要过硬的体能、意志、技术和直接行动来具体支撑和实现。

过硬的体能首先是从强忍高山反应而吃饭来开始：“一碗及格，两碗良好，三碗优秀”。新兵上山之初，往往吐得直泛酸水、晕得头痛欲裂，根本没有食欲和气力。但半年硬性训练之后，每天早晨跑3公里都没问题了，全能达到全军统一的训练大纲各项具体指标了。

在全军加速现代化、以提高战斗力为目的的今天，对官兵的文化知识要求日益提高。4年军旅生活中，昔日在校时显得单调、遥远的各教科书本条文，逐渐在战士心中化为活生生的政治、历史、语言、地理、物理、化学、生理乃至天文学知识和种种具体的专业技巧。常怀军因此大有收获，并深信会终生受益。

在这自然条件严酷、地旷人稀的高原边疆，部队中互助互谅的战友之谊尤其纯洁。这不是简单的哥们儿义气，而是简直能达到同生共死的境界。同甘共苦之中，战友直率得早忘了客气和客套，“请”和“谢谢”之类从来不用，相对无语之时仍能息息相通。种种无言描述、无意表白的真诚，即使换下军装、天各一方之后多年仍能依然不变。这些，在人满为患、竞逐日烈的都市城镇，几乎已是不再重现的神话，但常怀军深信自己会永存这笔财富。

正因如此，此时的常怀军丝毫不胆怯慌张，更不怀疑连里的弟兄们马上就会来到身边。他现在关注的只是排长的呼吸和冷热，同时用眼睛和耳朵搜索着援兵已近的每一点微弱的信息。

他最先是见到了摇曳的手电闪亮，继而从渐强的呼喊中辨出指导员的声音。

“来了！我们在这里！”

赖万峰扑了过来，从另一侧架住了已经站直的杜建国：“好点吗？能走啦？活动活动，慢慢往回走，马上能迎着他们。”

赖万峰的猜测没有错。才走出不到一公里，八座吉普已经“叮当”作响地刹在3人面前。车还在山路上盘旋之际，卫生员已经微笑了：“不是阑尾炎。就是吃凉东西喝冷风加上过累的急性肠炎，有些虚脱。幸亏救得快。回去吃药、休息，两天就能好。”

北京时间上午10点，黎明又姗姗来到木吉，赖万峰又在连部门口转悠了，眼白上有血丝，但精神饱满。

乌鲁木齐和喀什来的两位少校跟着忙了一夜，现在第一句话还是问起杜建国：“咋样了？”

“没事的，别提心。”

“再观察观察……你也该多休息一会儿。”

赖万峰一笑：“这种情况巡逻时见多了，好多次比这还吓人呢。只要救援及时、不再加重，那就没啥。这都属正常情况……我也不能再睡了，等会儿大家一齐去那对柯尔克孜老人家帮忙，做点好事。”

进山了，才知道什么是苦。走路，直上直下，旱蚂蟥把人叮得从鞋里往外渗血。宿营，山风刺骨，冻得人划不着火柴。断粮时，食野果尝百草，吃坏了牙，吃肿了脸。有人从悬崖上跌下去，头破血流；还有人献出了生命。

“野人”、尼斯湖怪兽、飞碟和百慕大三角被称为当今世界四大谜。大自然的造化把神农架赐给了中国。在有“野人”传说的几个国家中，神农架是传说“野人”活动最多的地区，不去发掘，可能是对祖国宝贵资源的浪费。今生今世，岂能失去参与的机会！为此，于氏兄弟等科学考察队员不惜身家性命，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神秘而又充满艰险的神农之路。

魂系神农

隋 桦

上 篇

山里有谜

说起神农架的“野人”之谜，如今可谓人人皆知，可当年在谁都不知道的时候，却有一位潜心于此并启告世人的北京长者，他叫李建。李建 1948 年从北师大历史系投笔从戎，“文革”时任湖北郟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在房县和神农架下乡工作时，逐渐听到众多神农架人目击“野人”的事情，兼之对从屈原的《山鬼》到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等上百种史料的分析，相信山里确有一种身长脚大、棕灰毛长、两腿直立、奔跑迅疾、居无定所的珍稀动物，感觉其中意义非凡，于是带着老伴明泽和女儿爱萍以及全部积蓄和身心投入野考事业，并以首任民办野考协会会长兼秘书长易份，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去芜存菁，整理出近百万字的历史及研究资料。久而久之，当地人或褒或贬地给老李送了个“野人部长”的绰号，而科考圈里人则尊称这位 1995 年去世的老共产党员为卓越无私的组织者、开拓者。

在神农架“野人”之谜通过各种媒体在中国渗透时，北京后海岸边鸦儿胡同 73 号的小四合院内，一位叫王方辰的国家环保工作者正思考着一个源于神农架而又绝不仅仅属于神农架的问题：

在众多自然之谜中，人们最关心的是与自身相关的话题：究竟有没有在向智慧人类过渡中走入歧途而尚存于世的大型灵长类动物——“野人”？实际上这也是对整个人类起源研究的反思。著名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科考队总顾问贾兰坡在科考队成立大会上说：我研究了一辈子古人类学，不是越来越清楚而是头绪越来越多。

自从达尔文提出“从猿到人”的大胆推论后，全世界的考古学和人类学家便在地球各个最有可能找到人类“祖先”的地方挖掘，至今仍未找到连续演化的证据。相反，找到的证据是人类出现的年代比猩猩出现的年代还要早。达尔文当年对所有的化石不能做年代测定，实际上已发现的猩猩化石距今均在 200 万年以内，而猿人化石的年代却早得多。肯尼亚的南猿化石距今 400 万年，中国云南元谋猿人化石距今 170 万年。河北阳原泥河湾盆地出土的 160 万年前的细小精致的石器工具，更使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瞠目惊奇！

到底谁是我们的祖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历史究竟有多远？

是非与否，皆须证据。7500 万年前的恐龙化石尚且完整，可是人类进化

的完整证据呢？一个更为大胆的想法是：人类演进模式的证实，以及寻找智慧人类的根源，应以生物演化为基础，而“野人”或许正是人类演进这条纽带上的唯一的一个活化石。

古老神秘的神农架，区域广大，地势复杂，植物丰富，气候多样，曾经长久地保持着原始洪荒风貌，适于野生动物长期生存，特别是幸存着不少第四纪冰川期以前的生物物种。

现代人类起源研究认为，热带雨林地区恰恰不适合人的进化，神农架的纬度位置和气候条件及其“野人”现象，加之邻近地区多有猿人和巨猿等化石发现，被专家们认为是最有可能存在着人类演进活化石的地区。所以自70年代以来，国家曾几次组织考察，恰恰也为自费参与的有志之士提供了机遇。

1980年，正是中国青年热衷于讨论如何实现自我价值的年代，这同样是刚刚从陕北返京的知青于建和大哥于军、二哥于工的热点论题。

某日，于建偶然在《化石》杂志上读到《向科学挑战——“野人”之谜》的文章。一直渴望建功立业的哥儿仨议论起来，读书搞科研：学历不行；参军打仗：超过了年龄。可为国家揭开“野人”之谜，只要肯舍命肯吃苦肯出钱，不信铁杵不成针。于是他们连夜致信中国科学院，坚决要求自费进山寻找“野人”。古人类所的教授半真半假地问：进山后断粮怎么办？于工坚定地回答：“野人”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可自费考察需要钱，哥儿仨穷得只有一口大立柜，卖！蹬三轮绕半个北京问了四个委托行才卖出40元，用它当本钱买台放相机，以于建的名义上街道开出一封知青从业证明，进国棉二厂为女工洗照片，微利多销，4寸的0.15元一张，6寸的0.20元一张，隔日交货。爱美的女孩排起长队。他们三个月挣出1300多元后就关门走人。

一条化纤毛毯，一把自制长斧，一架照相机，10斤大米，于建、于工两人走进神农架，加入了中科院武汉分院的考察队。

进山了，才知道什么是苦。走路，直上直下，旱蚂蟥把人叮得从鞋里往外渗血。宿营，山风刺骨，冻得划不着火柴，只能把所有东西裹在身上彻夜聊天或者干脆原地跑步。吃饭是最大的问题。别说做饭只能在烘热的石头上贴面饼，只提60斤的行李大部分是粮食，但仍然避免不了断粮。为能多坚持几天，他们像神农一样挖野菜尝百草，吃坏了牙，吃肿了脸。终于，于建因饥寒交迫从4米多高的悬崖上跌落，摔得头破血流昏死过去。于工把弟弟背到崖下的石缝里为他洗净伤口，并用最后一把炒面喂于建，然后彻夜端坐在他的身边，为他遮挡冰冷的夜雨。

每个科考队员都有遭遇野兽的经历。最不好对付的是野猪和黑熊，豹和老虎还在其次，与毒蛇赛跑是常有的，和黑熊相遇就更多。要说惊险，两只毛茸茸的熊爪从身后突然搭在双肩上，听着都让人发怵。老科考队员李孜当时在一瞬间领悟了佛家“禅”的境界，万籁皆空，感觉自己向着无底深渊坠落，一动不动整整两个多小时，熊才离开了他。

于工和于建没逮着“野人”，倒是捕养了一头小熊。小黑熊憨态可掬，调皮惹人爱，又通人性，给科考队员的业余生活增添了不少欢笑。一次在途中小熊被盗，哥俩儿火急火燎满处寻找，恰巧走过盗贼藏匿小熊的门外，嗅觉极端灵敏的小黑熊一下子就闻见了主人的气味，便一个劲地挠门，被哥俩儿即刻察觉，解救了小熊。此后兄弟俩对小熊更是怜爱，只是转眼间小熊个头及人，哥俩儿在日常生活中无法料理这位大块头，不得不把它送给了马戏

团。分别时，小熊那恋恋不舍的凝视目光，使于建深深感到动物也都是人类的朋友，“野人”自然不会例外。

下 篇

人间有志

1995年春，几十位像于氏兄弟一样的男女志愿者在王方辰的小院里相聚，像当年手捧红宝书一样捧着国家批准他们组成“奇异珍稀动物考察专业委员会”的批文。

十几年来，他们中每一个人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可正因为这追求，他们不仅没有致富，反而都失去原先稳定的工作收入，落得更加贫穷，甚至负债累累。委员会秘书长王房辰手中的全部财富就是5000英尺的电影胶片资料和包括卫星定位仪在内价值10万元的考察设备。可他从来没敢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于氏兄弟在朋友的公司打工，目的便是凑足一笔考察费后进山去蹲上几个月。

十几年来，他们失去了许多。因为吃酸野果子太多，一些人的牙齿过早地像老人一样疏松变质，一些人失去了家庭，一些人失去了工作，因为他们的妻子和领导不明白他们这是为什么。当然他们也得到了许多，除了发现“野人”的脚印、粪便与毛发，他们人人都成了探险专家，从雨天生火到与野兽搏斗，从识别地形到制作动物标本，更重要的是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理解。

京城不少民间企业家，纷纷鼎力相助。一家服装厂为他们缝制了几十套御寒的迷彩服；一家公司送给他们几顶折叠帐篷；还有的捐赠解放鞋、饮料、胶卷等，中央电视台借给他们一套准专业摄录像设备，并准备为他们的考察过程拍摄专题片……这些都使他们更加坚定而且百折不挠。

1995年夏，正当他们筹备一次集体考察之时，当地旅游委员会突然悬出货额：找到一个活“野人”赏50万元人民币，一具尸体10万元人民币。一时神农架数百探险者为重利所惑而聚，但不过月余都因过于艰苦而无一留下，只有考察队员无一退缩。

就在这时，考察队主力于工因过度疲劳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不幸殉职，考察队也因此陷入悲痛与窘迫中。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奇异珍稀动物考察委员会主任袁振新副教授闻讯后悲痛无语，怀揣一千元钱，扛起一袋大米，直奔于工家……

令人万分感动的是，当队员们前去慰问于工爱人贾美菊时，她强忍悲痛，首先询问同行队员的安全，于工年迈的母亲更是泣不成声地说：“你们可别因为老二去了就散伙呀！”

穷！的确是困扰考察队的一层魔影。

这些人多年来自我投资数以万计，但对探索神农架这片3200平方公里的神秘大山，实如沧海一粟。

考察委员会秘书长兼科考队长王方辰说，他是在倾家荡产为并不富裕的国家科考事业尽一份心，出一份力，只要能找到“野人”的直接证据，“野人”之谜得到世界范围的证实，而且由中国专家来给它一个科学命名，他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于工的弟弟于建说，他开始认为这事很简单，国家经济有困难，只要自

己出钱出力舍命就算为中国揭开世界四大谜之一的“野人”之谜做了贡献，可现在，他们已做好长期打算，因为任何科学探索都不是水到渠成，不能做已不可为之事，他的大哥于军则更期望在发现“野人”后能和“他们”交上朋友，由此促进人对人类进化和自身的了解。

1996年除夕和年初一，笔者是与本文的几位主人公王方辰、于军和于建一起度过的。王方辰先是拎着篮子上街采购，他说再穷也得过年，杨白劳躲债还知道给喜儿买条红头绳呐。于建正忙着打电话四处联络，把考察队募来的一批价值10万元的冬虫草精设法变成钱。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朋友的朋友，通了话就恳求，好话说了一大堆也不大见成效，有的人挖苦道：“你们还考察什么‘野人’？干脆改卖冬虫草精或乱七八糟的保健品算了。”于建也不着急，仍耐心解释，继续鼓吹冬虫草精的各大优点。于军在一旁默默地翻看着考察照片，当看到有于工形象的，便用粗糙的手摸上几摸，好像是真地抚摸弟弟的躯体一样。

王方辰买菜回来，便呆在库房里整理清点考察队的设备。库房是他们自己花钱从他家屋旁接出来的大约15平米的临时搭房。他一边整理一边不无自豪地介绍：这个卫星定位仪价值多少万，那几把工兵锹如何实用，那5000英尺电影胶片是几位考察队员在历次考察中拍得的金丝猴等珍稀动物的资料，价值连城，所有购买胶片的钱都是他一手筹集的……

每次只要一谈到考察队，谈到“野人”，谈到人的进化研究等等，王方辰那厚厚的嘴唇从不显笨拙，娓娓道来，比讲《一千零一夜》故事还要津津有味，更没有讲完的时候。

这时于建的妻子李红来看于建。他们夫妻感情很好，可是却很少住在一起，用于建的话说是一个人蹲山里蹲惯了，即使回北京也是东游西逛地独处。

李红非常爽快，说话利落痛快，无半点隐讳。她说她一向崇拜于家三兄弟，当然最崇拜自己的丈夫。当初于建那届高中生，本应到郊区县插队，可于建偏要报名去延安，全区的中学生都出来欢送披红挂彩的于建。就是在欢送的行列里，李红开始喜欢上于建，所以到现在她也支持他考察“野人”，因为她相信自己的爱人是在真正地生活，这种生活凝聚着一种崇高的理想。

王方辰捅开炉子，煮了五袋速冻饺子，拿出六个杯子，倒上酒说，杯子大了点，咱就一口算一杯吧。这第一杯敬于工兄弟，让他永远安息！第二杯为咱们的大难不死，为曲折坎坷的野考事业，为了今年筹集到足够的钱。第三杯有幸敬给桦兄，他挺赏脸，来和我们一起过一个穷年，听我们讲故事，喝我们的二锅头。他连饮三口，大家也都跟着。

1996年4月下旬，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特价书市，去逛书市时，笔者却在历史博物馆北门外的冷饮棚前与于军巧遇。他上身穿一件已显旧的夹克衫，下身是一条在北京已不时髦的绿军裤，正忙着向被太阳晒黑了的孩子们推销饮料。笔者买了两杯可乐兴奋地问：“于大哥，想不到在这儿遭到你。”

于军苦笑道：“这不，跑这儿发财来了。赶紧攒点钱，好早点进山。不是争取今年再进回山吗？还有于工那儿生前还欠着几千元债。”接着于军又倒了两杯饮料给我，执意说是免费，我也执意交钱，并说是为考察事业做贡献，心里却是一种难于言表的滋味，不愿再过多地去感受在这样场合下他的心态，匆匆离去了。

他们的确极普通，又的确很有个性，很贫穷又很富有，只因为他们拥有追求和理想。他们的努力无非有两种结果，拿到“野人”存在的实物证据同

时必然轰动世界，或者根本没有“野人”，而打破多少年来浪漫的传说和推理，但这些人的追求和牺牲本身给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生活赋予一种个性的光束和色彩，也值得品味和琢磨。

“野人”、尼斯湖怪兽、飞碟和百慕大三角被称为当今世界四大谜。飞碟之谜出现在空中并无定所，另外三大谜都是特定的地理区域之谜。英国一直出巨资搜索尼斯湖怪兽，仅一次毫无结果的考察，就出动大批舰船和高级声响设备，耗资 100 万英镑。

大自然的造化把神农架赐给了中国。在有“野人”传闻的几个国家中，神农架是传说“野人”活动最多的地区，不去发掘实际上也是宝贵资源的浪费。于氏兄弟的探险生涯动机其实如此简单：四大谜只有一个谜在中国，揭开的可能性最大，今生今世岂能失去这参与的机会？他们最高兴的事就是找到“野人”的毛发，他们也有自己的担忧和苦恼，那就是年增岁长，体力渐减，不知有限的余生能否完成“野人”考察。

爱因斯坦说过：人最宝贵的品质是好奇，而最大的好奇应是对人自身的好奇。历史发展到今天，人对自己的大脑、生理，对自己的发展史了解多少？“野人”也许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的人类演进过程的活化石，这也是科考队长王方辰不同于于氏兄弟的探险动机。

王方辰一直在制定从高空追寻“野人”行踪的计划，最好的办法是升放定位热气球装置，科用高科技望远镜、夜视仪及红外线设备跟踪摄象，居高临下日夜监视固定区域，这样搜索范围广，利于对行动迅速敏捷的“野人”进行追踪，不仅安全、易操作，还能对整个林区进行监控，监测自然生态环境，加强对火灾、非法捕猎等的防范。只需 3~5 个热气球即可覆盖“野人”出没的林区，拥有并启用这套设备，对“野人”是否存在会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一个热气球的费用为十五六万元人民币，虽说比用直升飞机的费用低得很多，考察队也肯定无力承担。因此王方辰多方求助，他多么希望有一个像支持北极考察的牟其中先生那样有眼光的中国人，来支持他的计划啊！

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这项事业，如果你愿意，你就可以用你认为合适的方式参与进来。中国对一些事情的意义的认识，经常落后于世界，非等到外国人说好时才如梦初醒。陈章良从恐龙蛋中分离出一个恐龙基因时，有多少中国人认识其价值？可在全世界科学界为之欢呼时，中国人才感到震惊。神农架的“野人”之谜，也许正是这样一件很艰苦、很漫长，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成功，但却能让世界震惊的事情。

刘让贤 15 岁那年随母亲从天津移民到青海，土乡人伸出欢迎的双臂，并送他到县城念书，回报这片热土的夙愿，从那时起便深深植根在他年少的心田。几十年的努力，他和他的小学上百次获奖获表彰。然而他常常问自己：我还能再做些什么？秃岭半山腰的什巴小学，分来的 38 名老师最长的呆了两年半，唯有刘让贤成了扎根的守望者。从他 8 年前当省劳模，到最近被中宣部作为先进人物典型推向全国，每一次获大奖，人们都猜测：这回他该下山了。但每一次；人们都见他更加执著地走在山间的小路上。

秃岭半山腰

马顺清 庞晓玲 韦熹

峰回路转，穿谷越岭。

在沟壑纵横的互助县东山乡寺尔村，在一道秃岭的半腰上，我们找到了主人公和他的什巴小学。

简陋的教室前，站着这位 57 岁的天津人：一身蓝布衣服已经洗得发白，一顶灰布帽旧得帽檐塌了几道弯，布鞋上沾满尘土，黑褐色的脸膛爬满皱纹，背微驼，挪动脚步时右腿有些僵直，说一口地道的青海话，朴实得像脚下的黄土，乍看去和当地人没什么区别。

山风轻轻吹过，校园里两排挺拔的白杨沙沙作响，平添了山野的清寂，山外的世界似乎很远很远，越发让人难以把那么多耀眼的光环与这平凡叠加在一起。

这位平凡的山里人就是全国先进工作者、青海省劳动模范、全省特级教师、十大杰出校长之一、香港柏宁顿“孺子牛金球奖”十大杰出奖获得者——互助县东山乡什巴小学校长刘让贤。20 多年来，他先后 68 次受到国家、省、地、县嘉奖；这所穷乡僻壤里的小学，在他率领下，先后 57 次受到国家和省、地、县表彰，成为青海高原教育战线的一面旗帜。

1956 年，15 岁的刘让贤随母亲响应政府号召，从天津移民到青海，在互助县陶家寨村安家落户。土乡人伸出热情的手臂接纳了这家外乡人，并且筹措助学金，送刘让贤到县城念书。回报这片热土的夙愿。从那时起便深深植根在他年少的心田里。1959 年，思念故土的母亲决意带儿女们回天津，而刘让贤却执意留了下来。为了报答土乡父老的深情厚谊，他成了土乡的一名小学教师。1977 年，正是祖国摆脱浩劫、百废待兴的岁月，组织上委刘让贤以重任，派他到离家 15 公里的东山乡什巴小学担任校长。

东山乡，一百多个山头，三百多条沟壑，世代代居住着土族群众。这里干旱缺水，自然灾害频繁，全乡至今还没有一家乡镇企业，40% 的农户是贫困户。什巴小学所在的寺尔村缺水没电，不通班车，老乡们出门下沟，抬脚上山，连打麦场都是从山腰上削出来的，去一趟县城得 25 公里。刘让贤初来那天，老村长把他领到山头上一个简陋的院落前：“这就是我们的学校，山里苦，你将就些，今后就靠你了。”刘让贤平静地审视着他的学校：几段残垣断壁围着 5 间破旧不堪的教室，四面窗户上没有一块玻璃，课桌是一排土台子，4 名教师领着 5 个班的 68 名孩子。这晚他在支书家的土炕上蜷缩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下了山。山民们说：“外乡人就是外乡人，来了半天就吓跑了。”但是傍晚，刘让贤却出现在坎坷的山路上，背着行李卷，拎着干

粮袋。他回来了，住下了，而且这一住就是 21 年。

每天下午放学后，他揣把手电筒，匆匆奔上山路，找村干部了解情况，挨家逐户动员土族群众送子女入学。学校附近有 9 个自然村，最远的十几里，最近的也有四五里，刘让贤每天翻山越沟几十里。人们看见，土乡夜晚的山梁上，一束手电光常摇摇曳曳。山民们看出刘让贤是个实心实意替乡亲们办事的人，村委会主动配合，专门成立了“发动学生小组”。乡亲们出工献料，拿钱出力，在县教育局的支持下，在山腰较平坦的地方修建了新的学校。越来越多的群众把娃娃送到了刘让贤身边，入学率从原来的不足 50% 上升到 86%，很快提高到 100%。

在刘让贤一进校就建立的学校大事记上写着：9 月 3 日，报到完毕，一年级学生不会数数，不会说汉语，连“老师”也不会叫。刘让贤开出了偏方，低年级由土族教师用土语教学，逐步学习汉语，自己担任五年级班主任和语文课教师。学校太穷，没有一本可供孩子们阅读的课外书。每次到县城开会，刘让贤都将会议室里丢弃的烟盒糖纸仔细收集起来，细心展平，带上山去。有一回在县委收发室里见了半本没人要的《人民画报》，他如获至宝。凡是他能找到的有字有画儿的东西，包括人民币都成了他的教材、孩子们的课外读物。他给孩子们讲，烟盒上的“9.5”是青海解放纪念日；糖纸上的米老鼠是美国迪斯尼乐园的动画明星；壹元人民币上印的是万里长城；贰元人民币上有海南名胜“南天一柱”……知识的甘露点点滴滴滋润着孩子们干涸的心田。几个月后，他从每月 56 元的工资中，攒下了 150 元钱，购买了图书和简单的文体器材，创办了少先队活动室，供孩子们学习、活动。

要让孩子们读到更多的书，刘让贤清楚，他那点工资毕竟是杯水车薪。靠山吃山，土乡的山野中生长着一种名叫冬花的药材，开在初冬，收购价格不错。每年冬灭，刘让贤便带领师生跑遍所有生长冬花的寒山深沟，刨开冻土，挖出冬花，再到刺骨的山泉中冲洗干净，玉米粒大的花蕾 5 斤才能晒出一斤干的。铁铲磨破了手掌，山风咬得他们满手背都是裂口，但这是土乡唯一的山珍了，所以刘让贤总在盼着冬天的到来。他用挖冬花卖的钱，给每个班订了几份少儿报刊，每天下午指导学生阅读一小时，仿写一段话。什巴小学“人人和书报交朋友”的读书读报活动，从那时起坚持至今，从不间断。人生聪明读书始，孩子们从书报中了解了山外的世界，学到了知识，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学习成绩特别是写作水平很快提高。昔日连句子都写不通顺的土族少年，有 13 人被 5 个省、市的少儿报刊聘为特邀小记者；25 人的 32 篇习作上了《中国少年报》等少儿报刊；35 人的 41 篇作文在全国和省、地、县小学生作文竞赛中获奖。

有年开春，县农科站送来一车塑料地膜，免费供农民使用。村民们像看西洋景似地看着这一卷白闪闪、亮晶晶的东西，任科技人员怎么宣传讲解，谁也不肯试一试。刘让贤听说后，立即组织学生开展了“种一块试验田，搞一次小考察，为家乡找一条致富路”的活动。他带领学生在学校后山开出六亩试验田，在全村第一个使用地膜覆盖种植洋芋，并请来农科人员指导学生学习小麦药剂拌种、合理施肥等耕作技术。收获的季节到了，试验田洋芋亩产比当地平均亩产高出近一倍，小麦亩产高出 80 多公斤，创下了当地粮食亩产的最高纪录。第二年春天，山乡的田地披上了银白的地膜。仍然是日出日落，春种秋收，但乡亲们的观念变了，耕作方式变了！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的庙会，是土族山乡的盛大节日。热闹的庙会上活跃着刘让贤带领的“红领巾科普宣传队”。他们“办一次科普图片展，发一批农科知识资料，演一台文艺节目”，给这一宗教色彩浓郁的传统的节日吹来了清新的春风，深深吸引着土族群众。几年来，这支宣传队在刘让贤指导下，收集、整理、刻印了2500多份农村致富信息的科技资料，发送给农民；帮助家中没有“文化人”的村民用药剂拌种750多公斤；为25亩农田喷药除害。前年，在省农科院的帮助下，什巴小学又成立了“红领巾气象站”，经过近3年的观察、记录，为气候多变的寺尔村编制了一份自然历，指导农事生产，孩子们成了山乡科技兴农的小帮手。金秋，当丰收的喜悦、新粮的清香飘逸在山山岭岭时，乡亲们带着洋芋、青稞来到什巴小学：“刘老师，尝尝鲜吧，庄稼收成好，有你和娃娃们一半的功劳哩！”

一个出色的教育行家总是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因势利导。11年前，当刘让贤得知《儿童时代》等8家少儿刊物号召为全国盲童捐款的消息后，立即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最佳的教育契机。在他看来，一个人对祖国、对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树立，正是从为他人送一份关心、献一份爱心开始的。他号召同学们“拣一斤废铁、拾一斤骨头，回收一只酒瓶”，把卖得的15元钱寄给了《中国盲童文学》杂志社，并通过《土族红领巾》发出倡议：“用千百颗水晶般的同情心，增强盲童与命运拼搏的勇气。”《中国盲童文学》主编、著名盲人作家徐白仑听说后，不等收到汇款就给土族少年来信：“我十分感动，你们的生活环境那么艰苦，还要千方百计为失明的小伙伴捐款，我们十分珍惜这份赤诚的奉献，谢谢你们，也谢谢培育你们的好老师。”

孩子们读着徐爷爷的来信，体会到了奉献的喜悦。刘让贤趁热打铁，将这一项活动拓展为“付一份劳动，做一件好事，献一份爱心”，11年来坚持不渝。他们种植试验田，植树造林、回收废品，采集籽种，创收两千多元。用一分一角凑起的钱，为全县贫困山乡的22所小学订少儿报刊，给西藏的小朋友购买图书，慰问五保户，资助贫困同学上学，给四川、安徽、陕西等灾区捐钱，为抢救大熊猫、修缮长城、北京承办亚运会捐款……回眸80年代以来我国历次大的赈灾和捐助活动，都有他们献上的一片爱心。土族少年和祖国大家庭同呼吸、共命运，成为新时代的“小雷锋”。

90年代，当全国城乡小学生开始“手拉手”时，刘让贤早在10年前就在什巴小学把这项活动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了。从1983年起，他就组织全校学生开展了“写一封信、寄一份队报、交一个朋友”的“三个一”心连心民族大团结活动。这年9月，刘让贤用学生勤工俭学的收入和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创办了全省第一份少年队油印队报《土族红领巾》。14年来，400多期7万多份队报像一只只白鸽飞向了全国21个省市的150多所学校，友谊的信使让什巴小学和全国40多所学校结成了友好对子，每一个学生都交上了刘让贤为他们联系的各地小朋友。孩子们放飞了理想，把彩袖衫的传说、白毡帽的故事和土乡的冬花、冰草传遍了全国各地。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来信，一件件珍贵的礼物从四面八方飞向了闭塞的土族山乡，汇成了温暖的云海，乡邮员每一次到来，都会让孩子们欢呼雀跃。什巴小学的荣誉室里，除了红艳艳的锦旗，金灿灿的奖杯，还珍藏了300多件来自全国各地的珍贵礼物。民族团结的金桥飞跨万里河山，把土族少年带到了山外的世界，让他们增了见识，长了知识，激励着他们发愤学习，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十多年来，刘让贤深深根植土乡的厚土，紧紧追随时代的脚步，组织学

生开展了 150 多项创造性的班队活动,其中有 30 多项在全国少先队活动竞赛中获奖。特别是在全国创造杯少先队活动竞赛中,7 次夺得金杯,成为全国唯一“七连冠”的学校。刘让贤根据班队活动实践编写的《创造性班队活动 50 例》已出版发行,成为省内各地小学学习的范例;他以自己的论文、学生习作点评为内容编纂的第二本书《大山里的冬花》也即将出版。一位山东来的教师在观摩了刘让贤的教学活动后,激动地说:“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么穷困的山沟竟有这样的老师,他使教学、育人和为两个文明服务达到近乎完美的结合,他的教育实践已步入了科学化、规范化、序列化的境界,即使与大城市的优秀教师相比,也毫不逊色。”

北京,1995 年 11 月的一个午夜,霓虹灯还在不停地闪烁,流光溢彩的宾馆已悄然睡去。刘让贤躺在床上,心潮澎湃,难以入眠。今天,香港著名实业家邓崇光先生为表彰优秀教师而设立的首届“孺子牛金球奖”在这里颁奖,他有幸和一批仰慕已久的中国当代教坛英杰汇聚一起,共商教育改革大计,共探教书育人艺术。他没想到,一个土乡的小学教师,竟荣获杰出奖,得到 10 万元奖金。10 万元。对他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能办多少大事啊:校舍得维修了,教师们的办公条件也得改善改善,还有那些可敬可亲的父老乡亲,曾圆过他少年的梦想,也该让他们分享这份荣誉。他披衣走上凉台,仰望夜空。土乡的山月今夜可有这般明灿?日月如梭,人生易老,自己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了。想到这里,他心头一紧:我还能再做些什么?

20 年里他常常这样问自己。

1985 年,刘让贤被评为县劳动模范,得到 400 元奖金,也恰在这时,妻子生病住院,负债 500 元。正是救急的时候,站在妻子的病榻前,刘让贤却心里翻腾着。他想起了自己的同事,那些和他一样清苦的老师,工作辛苦,生活单调,白天教学生,晚上数星星,看一场电影要跑十几里路。手,几次伸向胸前的口袋又缩了回去。妻子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该咋用就咋用吧,这债,咱慢慢还。”刘让贤感激妻子的理解,拿出 100 元捐给了她任教的陶家寨小学,余下的 300 元给什巴小学的老师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此后,他又被评为全国先进、全省劳模,组织上先后给他晋升了两级工资。用这两级工资和自己的一部分稿费,他设立了 3000 元的“什巴小学德育奖励基金”,奖励工作有成绩的教师。

女儿琳琳说:“我们家里就不能多个啥,爸爸的手最快,见了就拿走。”孩子们的记忆中留着一幕幕这样的情景:

前年,爸爸拗不过他们的缠磨,买了一台 17 寸彩电。一个周末,兄妹们正兴致勃勃地看电视,爸爸带着两个陌生人来了,吃完饭,就抱走了他家原有的那台“小黑白”。

“爸,你把小电视卖了?多少钱?”

“我把它送给岔尔沟小学了。”

爸爸望着他们不解的神情,温和而又有几分沉重地说:“你们不要有意见,那是全乡条件最差的学校,老师们吃的苦,你们想也想不出来啊。”

又是一个周末,爸爸赶着一辆马车回家来,打开高低柜,拽出衣服被褥堆在了炕角。妈妈急问道:“你干啥哩?”

“学校的档案成天堆在桌子上,丢了咋办?”

“那这些东西咋办?”

“供销社里不是有纸箱子吗？你去找几个来。”孩子们佩服妈妈，每次她总是淡淡一笑，由着爸爸。

事隔不久，一天，刘让贤又回来了。兄妹们惊呼：“妈，爸爸又赶着马车哩。”果然，他在妈妈耳边嘀咕了两句，就开始拆老二的床。

“爸，你拆我床干啥？”

“席老师没床睡……”

席杏英是什巴小学唯一的民办教师，工资很低，生了孩子后又请了一个小保姆，日子紧巴得连张小木床都置不起，晚上睡在拼起的课桌上，当教师的心思也就不免有几分动摇。刘让贤不仅给她送来了床头床板，还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10元贴补她。前年，席老师的妹妹要去山西治病，临走时刘让贤硬塞上150元。朴实的山村女教师把深深的感激之情埋在心底加倍工作，报答校长的关怀，打定主意要在山乡当一辈子“孩子王”。如今，她已是全乡优秀教师。

去年教师节，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到刘让贤家中看望他。这天阴雨绵绵，刘家的几间屋子都在漏雨，地上接了不少盆盆罐罐。而刘让贤却请了木匠在打家具，忙得团团转，衣服上沾着缕缕刨花，苍老的脸上，由于过度劳累而显出几分木讷。当县长知道他们夫妇是在给学校做书柜时，内心翻腾了，眼睛湿润了，他紧紧抓住刘让贤的手：“老刘，你不容易啊，抽空也该拾掇拾掇房子……”见县长如此动情，刘让贤心头一热，泪水和着雨水刷刷地流下，他点点头又摇摇头，一句话也说不出。他相信县长能懂他的心，面对那些可敬的老师、可怜的孩子，他只恨自己所能付出的太少……

他深情的目光始终追随着每一个学生。孩子们头发长了，他给理；交不起杂费，他悄悄垫上；缺少文具，他给买；谁有个头痛脑热，他亲自送到十几里外的医院，用自己的钱给看病。久而久之，这一切似乎都成了他分内的事。

从1993年起，刘让贤先后资助6名土族学生上学，3年来，已花去了3000多元钱。

20年来，他在学生身上花了多少钱，没人说得清楚，老师们粗粗一算就有9000多元。而那些年，他工资不高，妻子是民办教师，收入更低，3个孩子都在念书，日子过得很紧。大儿子在东北上学时，他每月仅寄30元，孩子不得不靠打工维持学业。

这一回，刘让贤捧回了10万元的大奖，人们无不为他高兴：刘老师这回该翻个身了。了解他的人却料定，刘让贤肯定又有“不凡之举”。果然，12月1日，他把一张2.4万元的存折送到了县教育局。县教育局拗不过执著的刘让贤，根据他的建议，用这笔钱设立了互助县学校德育工作奖励基金；随后，他又给什巴小学捐款1万元；给东山乡教委、县一中各送去了一笔钱，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给东山乡所有小学和教学点都买了一座石英钟；慰问了寺尔村和陶家寨村的老干部、老党员和贫困户。现在，这笔奖金已捐出4.77万元。他还拿出8000元自费出版《大山里的冬花》一书，并打算从今年起，每年再拿出1000元，用6年时间把县德育工作奖励基金增加到3万元。

在什巴20年，他对自己近乎刻薄，生活极其简朴。一个帆布干粮袋用了21年，已经看不出本色，几乎千疮百孔。1985年他到北京领奖，县教育局领导见他衣服太旧，花40元钱给他做了一身“蓝的卡”，领奖归来他又把钱如数交给了组织。他说：“国家还困难我们不能沾公家的便宜。”1989年

他到北京参加全国劳动模范表彰会，由于穿得实在太寒伦，几次大的游园活动，他干脆闭门不出。前年，刘让贤随全国教育代表团出访朝鲜，55岁的他第一次“西装革履”。西装是借儿子的，革履是花20元钱在地摊上买的“人造革鞋”，不到一个月就开了口子。他担任的社会职务较多，常常外出开会，为了不给学校增添负担，他从未报销过差旅费。前些年，他身体还硬朗，每次到县城开会，往返50公里都是骑自行车。……

20年里，什巴小学的老师走马灯似地换了一茬又一茬，先后分来的38名教师走了32个，最长的干了两年半，最短的只呆了一学期。而刘让贤，似乎成了永远的守望者。从8年前他成为全省劳模起，每一次获得大奖，人们都猜测，刘让贤功成名就，这回该下山了。但每一次，人们都见他更加执著地走在山间的小路上。

山里的村民和孩子们对他的热爱，让他从灵魂深处感受到了一个人民教师被尊重、被理解的幸福与满足。他说：“我从来没有设计过离开他们的生活，那一双双充满着爱戴与渴望的眼睛，便是维系我生命的希望”……

